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沈从文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沈从文传

XXX 编著

目录

第一章	自然之子.....	003
一、	大难不死.....	003
二、	逃学“专家”.....	005
三、	幼眼看“革命”.....	009
四、	水中情.....	012
五、	梦里将军.....	016
第二章	在铁与血中.....	020
一、	么师爷传奇.....	020
二、	玫瑰色的骗局.....	034
三、	凝眸人类的智慧.....	041
第三章	索解人生的方程式.....	054
一、	北京街头的“乡下人”.....	054
二、	三人行.....	066
三、	“只有你有这种魔力”.....	075
第四章	在困境中崛起.....	081
一、	丁玲事件.....	081
二、	正当盛年.....	088

三、	构建人性的神庙.....	094
第五章	风雨一扁舟.....	104
一、	逃难——寂寞之旅.....	104
二、	烛照人生抽象之域.....	111
三、	飓风孤舟.....	115
第六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	127
一、	在退避中进取.....	127
二、	笑面狂飙.....	134
三、	夕阳无限好.....	143

第一章 自然之子

一、大难不死

在湖南境内，有一个美丽的小镇，叫做凤凰。原籍新西兰、在中国居住了十年之久的艾黎老人认为它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之一，另一个则是福建长汀。

小城坐落在一个山洼里，四周都是山，远离尘嚣。山上古木参天，林深草密，常有野兽出没，鸟儿则更是常见。据当地的老辈人讲，早年常常听见一种不知名的鸟叫，声音婉转清越，绵远悠长。有人说这就是凤凰，也有说是九头鸟，凤凰城是否因此而得名，不得而知。

沈从文，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便降生在这里，其时是1902年12月28日的凌晨。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取名为沈岳焕，而非沈从文。

沈岳焕天资聪颖，深讨家里人的喜爱。从4岁起，母亲便开始教他认字。就在这一年里，他又添了一个弟弟岳荃，母亲便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看他。凑巧的是两个姐姐正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于是他也就跟了去一起读书。但毕竟年龄太小，读不到什么书，更多

的却是在女先生膝边玩耍。

到弟弟两岁，岳焕六岁时，两人同时出了疹子。在当时的湘西，人们还不懂得种痘防疫，出疹子便是生命的一大劫关，死生很难预料。这病来得凶，家里的大人都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棺木，对兄弟二人不抱任何指望了。就在家里人完全绝望的时候，岳焕和岳荃居然奇迹般地脱离了死神的魔爪，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因为这次生病，沈岳焕变成了一个“猴儿精”，给父母带来了无边的烦恼、满心的担忧。

二、逃学“专家”

病好了以后，沈岳焕便被送到私塾去读书。

学习的内容照例先是《幼学琼林》，而后是《论语》、《孟子》、《诗经》。学习多是死记硬背，至于学生是否明白章句的意义，那却不大过问。按规矩，如果学生该认的字不认得或是背不出书的话，就得被打屁股。由于上学时就识得很多字，再加上天性聪明，沈岳焕头半年里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享受”这种待遇，学得倒也轻松自在。

私塾生活呆板而又无生气，整天点书、读书、背书、温书，还有写大小字，非常单调。时间一长，这位沈岳焕便再也坐不住了。他发现同学中有人逃学，却还能用谎话骗过先生，于是他也加入了这群逃学者的行列。

第一次逃学，还真有点害怕，心怦怦乱跳，在大人面前还红了脸。第二天壮了胆子去见先生，先生见面后即问：“昨天为什么没来？”他不由地又红了脸，嚅嚅着答：“昨天家里请客。”先生相信了，没有责罚他——家里请客可以不上学，这已经成惯例。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偷尝了“禁果”的滋味，沈岳焕的胆也如气球般飞涨起来。于是逃学便成了很平

常的事。常在河边走，不怕不湿鞋，逃学终于被家里发现了。第一次被发现时，气坏了父亲，因为父亲是想做将军的，自己没有当成，便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父亲吼着要砍掉儿子的一个手指，但手指终于没有被砍掉，沈岳焕却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还得罚跪。惩罚非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孩童时的沈岳焕滋长起反抗情绪。

家里给沈岳焕换了一个较远的私塾，在他外祖父隔壁。先前的学塾离家近，不仅逃学不易避人耳目，即便在路上多呆一会儿，还要绕道而行。时间耽误太久，迟到了不容易找到借口。但现在因为路远，不必再抄偏街，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长街上一路蹭过去，经过许多有趣的地方了。于是，沈岳焕在读学塾的小书的同时，习读起了凤凰城内外的自然和人事写成的的大书。

在上学的路上，沈岳焕一路停停走走，他被街上的一切吸引住了。沿街排列着各种作坊：针铺、伞铺、皮靴店、剃头铺、肉铺、金银铺、冥器铺、染坊、豆腐坊。各种事物让他看得眼热心跳，他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些东西。学塾位于北门，沈岳焕却从东门进西门出，再入南门，在完成这门必修课的各道程序之后，才绕城里大街朝学塾走去。

随着年龄的增加，逃学便成了积习，之后挨打受

罚便成了家常便饭。除了痛打以外，照例是罚跪。点上一根香，不等香燃尽不准起身。同一种药服用多了会产生抗药性一样，罚跪也渐渐对沈岳焕失去了效用。跪在房角处，脑子里却信马游缰，海阔天空地想着各种的事情。20年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与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平常人惯于把不用心学习看作不走正道，没有出息。但在沈岳焕眼里，读书只把认的字记一记，那不算什么稀奇，也毫无趣味。最让他觉得稀奇的，是那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骡子推磨时要遮住眼睛？为什么刀烧硬时要放在盐水里淬才能硬？贴佛像用的金箔为什么会那么薄，不用胶水就能自己粘上？一切的一切都太古怪了。世界充满了谜，而谜底却不知在哪里。先生和父母不会帮助他，他也不敢去问，他常常为此发愁，于是便自己试着去寻找答案。

生命有了扩张自己的冲动。这种扩张既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的道路，要想获得有益的发展，就不得不靠自己的脚踩出一条路来。他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从比较中鉴别谁好谁坏，这简直是一种方法论的胚芽！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的所做所为，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模式，都可追溯到童年。倘此说法有些道理的话，当我们去仔细观察沈从文成熟后的

思想、行为模式时，便不难发现其中晃动着童年沈岳焕的影子。

三、幼眼看“革命”

读了几年私塾以后，沈岳焕曾中断过一段时间没有上学，因为此时辛亥革命的战火漫延到了这个小城。当地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湘西的各个反清帮会组织以及当地的苗族八大首领，组织起人民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在这支起义队伍中，绝大多数是苗族群众。苗族人成为义军的主力，这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受封建压迫以外，更与苗族与满汉统治者之间长期的民族矛盾有关。长期以来，苗族被视为“蛮”“夷”之族。苗族人民政治上毫无权利，被随意屠杀、买卖，随时承受“苗人杂种”。在许多苗汉杂居区，为维持生存，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苗人身份。原属苗人的大量肥田沃土，被屯兵和客民地主强占。商业也操纵在外地人手中。即使起义的本地汉民，也直接感受到外来官吏、商人对湘西本地人的压迫与剥削。因此这次起义是专冲着官吏和外路商人来的。沈家也参加了这次起义，包括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

由于原来答应接应的城内官兵临时变卦，这次起义之火刚刚燃起便被扑灭了。起义队伍被击溃，清军紧接着又开始了搜捕与屠杀。

旧戏和故事里“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情景，过去只存在于沈岳焕的想象里，遥远而又模糊，如今却被一下子推到他身边，血淋淋地呈现在眼前。衙门前的平地上，衙门口的鹿角上、辕门上，从城外缴获的云梯上，悬着的、挂着的、堆着的全是人头。夹杂在人头中的，是一大串被割下的人耳朵。虽然沈岳焕以前在牢狱附近的杀场里也见过死尸，但一次杀这么多人，却还是第一次。

镇压完起义以后，衙门便派兵下苗乡捉人。被随意捉来的多是些无辜农民，照例不需任何罪证，便被赶到北门外河滩上去砍头。这种残酷的大屠杀持续了一个月，沈岳焕站在城头上看杀人也有一个月。

沈岳焕并没有什么恐惧，有时还和其他孩子比赛眼力去数河滩上尸体的数目，却在心中感到了莫名的疑惑：为什么这么多人一下子就被杀了，就像不是杀自己同类似的？为什么要杀他们？沈岳焕原先企望的儿童游戏般的乐趣没有得到，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费解和困惑。

到年底，杀人终于停止。因为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革命党人重新聚集了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12年初，凤凰道、亭衙门宣布投降，外来的镇守使、道尹、知县离境走路，革命算是成功了。

革命给沈家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变化。先是衙门投

降后，地方一切交由乡绅主持，沈宗嗣因暗中参与革命在民主选举中成为本地要人。但不久因为在省议会代表选举中失败，一气之下跑到了北京。这次出走，以及后来的冒险之举，直接造成了沈家在凤凰的败落。

四、水中情

革命在凤凰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变化，边城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革命的种种情景被藏进了记忆的深处，不再占什么位置。沈从文又去读一本小书和一本“大书”了，其时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沈岳焕转到了当地的第二小学，当年他十二岁。由于这是一所新式小学，学校不诵经书，不随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可以在小院中玩，七天中还有一天放假，沈岳焕就不再逃学了，但每天去看“大书”仍是他的必修课。

半年以后，沈岳焕从城内的第二小学转到了城外的第一小学。新学校临近高山，房前屋后都是树，同学又多，自然是沈岳焕更喜欢的，这里简直成了他的乐土。他和同学比赛爬树，跟同学去采草药，他还学会了钓鱼，采笋子，摘蕨菜。城外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富有吸引力，他为自然的美丽赞叹不已。沈岳焕以后认为“我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十倍。”

那时候沈家每年还有300石左右的田租收入。因此沈岳焕便有机会跟长辈们到二十里外的乡下去，

督促佃夫和临时雇佣的短工割禾。乡下有城里所没有的新鲜事物，沈岳焕也有了与城里不同的玩法——去田里辨别各种禾苗、害虫；用鸡笼到水田里罩取鲫鱼、鲤鱼；向佃户讨斗鸡；剥桐树皮做哨子……

最有趣的要算打猎了。春天，到山中野雉交配季节，将驯养的雉媒带到山林抛出勾引林间野雉。待野雉飞近，举枪便打。等候时的期待，野雉飞近时的急切，枪中鹄时的喜悦，永远不会使沈岳焕感到倦怠。秋末冬初，他去看佃户们下围，跟着他们满山乱跑。有时佃户们将沈岳焕捆在大树的高枝上，让他看被追赶的黄麋如何惊恐万状地从树下跑过。他还看见一对狐狸被追得在大树根下乱转，后来这对狐狸的毛皮便成了他叔父的马褂。

城边的河是极赋乐趣的所在，总是能找到一些快心事。

放学时若天还早，几个人便出城去看看，有谁的柴船无人看管，瞅准了以后，匆忙跳上了船，飞快地向河心划去。等到船主来时，便和船主戏耍一番，然后，才跳上岸去。

河里有很多鱼：鳊鱼、鲫鱼、小鲃鱼。钓鱼的人多向上游游去。隔河是一片苗人的菜园，河滩上各处晒满了白布和青菜，每天还有许多妇人背了竹笼来洗衣，用棒槌在流水中捶打，匍匐地从城墙脚下应出回

声。

天热时，到下午四点以后，满河都是赤光光的身子。有些军人好事爱玩，还把小孩、战马、看家的狗，连同一群雏鸭，全都带到河里来。

沈岳焕和他的伙伴们常到上游一点去，那里人少，水还极深，很投他们的脾气。当然，出来游泳是要瞒着家里的，因为家里担心他被淹死，管得极严。每天饭后沈岳焕出门不久，他的那位管束侦察他极负责的大哥总要到河边走一趟。他大哥有些近视，人丛中找不到沈岳焕，就沿河去找他的衣服。找到了就抱起远远地坐到大路上，等着弟弟来会面。然后两人一块回家，不过沈岳焕的一顿打是逃不掉的。经过几次教训以后，沈岳焕就想着办法藏起衣服，不让大哥发现。两个人一个抓，一个躲，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虽然偶尔被守株待兔的大哥抓住，但更多的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家门。

下河若在平常日子，多半是三点午茶以后才去。如果遇上星期天，则常常几个人先一天就约好，到河上游一点棺材潭的地方去。泡上一整天，泅一阵水又摸一会儿鱼，把鱼从水中石底捉得，就用枯枝在河滩上烧来当点心。

人既长大了些，权利自然也多了些。即或家里知道他下了河，只要不是当面被捉，也就不再打了。到

参军之前，他能在河水中游三个来回。

水对沈岳焕的影响极大，他在《从文自传》中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候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五、梦里将军

沈岳焕似乎注定在学校里待不长久：在民国五年（1916年），他参加了预备兵技术班，然后到了第二年的七月份，他便参加了军队，开始了在沅水十三县的流荡生活，接受另一种人生教育。

沈岳焕去参加预备兵技术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不过是一时的心热而已。在当时，地方上受了蔡锷讨袁战事的刺激，感觉军队非改革不能自存，于是本地设立了四个军事学校，用新式的方法训练军官和士兵，地方因此气象一新。本地人都觉得学军事有出息，一个与军官陈姓教官作邻居的，要求这教官饭后课余也教教孩子，于是就办起了预备兵技术班。不过半月，就招募了100多人。沈岳焕看见那些受过训练的同学，精神显得比较强悍。同学告诉他到里面的人两个月考一次，考取了可以补上名额当兵。沈岳焕便去问母亲的意见，他母亲也便答应了。

也许有人会问以沈家当时在凤凰的地位，沈岳焕就是一个少爷，怎么对当兵感兴趣，他母亲又如何会答应呢？其实，在当时的凤凰，当兵不是耻辱。多久以来，文人只出了个翰林，即熊希龄，两个进士，四

个拔贡。至于武人，随同曾国荃攻入南京城的就出了四名提督军门，其中就有一位是沈岳焕的祖父沈宏富，还有后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朱湘溪，曾任蔡锷的参谋长，出身保定军官团的，更有一大堆。本地的光荣乃是无数武人流血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几乎唯一的出路。再加上那时沈岳焕的哥哥受家里嘱托，北上千里到热河寻找父亲，他更是日益放肆，不易管教，母亲正拿他没办法。既然有机会考一份口粮，班里规矩又极严，与其让沈岳焕在外面撒野，不如让他去受些训练。这么想着，沈岳焕的母亲就为他缝了一套灰军服，让他去了。

说来也怪，沈岳焕的野性还真被管束住了。整天立正、稍息、齐步、跑步、正步、卧倒倒也练得认真得很。技术班的训练，锻炼了沈岳焕的体质，也磨炼了性格的坚韧。其间他曾参加三次守兵缺额补充的考试，虽然均未考中，家里仍然很高兴。因为第一次考试时他得到军部奖语，家里以为他已经走上正路了。

军部的奖语让沈岳焕很得意，他觉得他应该去上陆军大学。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他讲祖父作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在他身上潜移默化，遇上机会，便被诱发了出来。吃过晚饭，他便和班里的一个好朋友穿上灰军服，有意挺起小小的胸脯，气昂昂地从街上走到城外。他认定自己总有一天要当将军，走起路

来便俨然有了将军的气概。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生活在作将军的想象里。据沈岳焕自己说，这种当官作大事的意识，是他在保靖读了许多书以后才被清洗的。然而，他后来的厌官从文，终不过是中国人“兼济天下”的心理模式换了个形式而已。

大约八个月以后，因为陈姓教官被调走，技术班也就无形中解散了，沈岳焕便又回到小学，一边读书一边野，旧态复萌起来。大约也就在这前后，沈家开始败落。

沈岳焕的祖父原是卖马草的出身，后来参加了湘军中的 军。曾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因为军功，这位沈宏富在二十二岁左右便得任云南昭通镇守使，二十六岁即任贵州总督，后因创伤而英年早逝，但他的一份光荣与产业使他的后嗣在地方占了个较优越的地位。沈岳焕的父亲沈宗嗣也是军中的官员，最高的职位也不过作到后来的上校军医。在庚子年大沽失地时，他是罗荣光的一员裨将，逃出时带在身边的一些珠宝全部丢失，便毁去了家中产业的一大半。辛亥革命他出走到北京，因刺杀袁世凯事败，在外避难，欠下了一屁股债。家中为了还债卖去了大部分田地和不动产，还了几笔较大的债务，景况一天天地坏了下去。其时他二姐也因生病死去了。家中大哥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姐迟早要出嫁，小弟过继给了叔父，小妹

方才五岁，原指望沈岳焕能一改劣习，为家中争气，却不想事与愿违。与其让他在家堕入下流，倒不如将他送出去受些磨难，在各样机会上去做人，在生活中得到知识与教训。恰好一个家住城里的杨姓军官此时带兵路过凤凰，沈岳焕的母亲便向他说及家中情况，那军官答应让沈岳焕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去辰州。如此一来，也就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

这次从军，是一个从少爷和想象中的“将军”向现实中的士卒的跌落。由这一跌落产生的精神和心理的落差，使沈岳焕从天真的想象里惊醒过来。命运之手正将他从富贵温柔之乡攫出，扔进不可知的人生漩涡。这是不幸，还是幸运？这一点实在是无法说清楚。

第二章 在铁与血中

一、么师爷传奇

到了辰州(也称沅陵)以后,沈岳焕被编入支队司令的卫队。卫队成员清一色头脑单纯、身体结实的小兵,大的不过22岁,小的只有13岁。大家睡硬木板垫砖头拼成的通铺,吃陈年糙米饭。每天的功课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每天早晨的跑步。照例起床号吹过不久就吹点名号,一点完名就下操坪跑步。下午无事可做,便躺在通铺上唱《大将南征》的军歌;领到枪以后,便坐在太阳底下擦枪。有时司令官出门拜客,选派二三十人护卫,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服务机会。由于沈岳焕原来在预备兵技术班呆过,学得一点军事知识,所以时间不长就做了班长。

此时,袁世凯已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死去,全国各地的大小军阀拥兵自立,各占一块地盘,做起了“土皇帝”。辰州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湘西联合政府,全名为靖国联军第一军政府。驻扎着三支不同的部队;军人首脑其一为军政长凤凰人田应诏,其一为民政长芷江人张学济,另一个却是黔军旅长后来回黔作了省长的卢焘。与之对抗的是驻兵常德身充旅长的冯玉祥。

两方面主要的经济收入都靠的是鸦片烟税。

单是湘西一隅，除客军一混成旅外，集中约十万人。全辰州地方约五千家户口，各部分兵士大致就有两万。由于各军联合组织有宪兵稽查队，故还不至于战争，但却常常会有小小的骚乱和磨擦。一军事会议的结果，上游各县重新作了统一分配，沈岳焕所在的部队被派到那总司令官的家乡芷江去清乡剿匪。

队伍沿着沈岳焕上次下沉陵的路线，乘小船溯流而上，四天后至高村上岸，再改变方向，步行三天至芷江所属的东乡榆树湾。在山谷狭径中，队伍两次遭到当地人的冷枪袭击，倒下了几个，大家咬牙切齿，恨恨不已，嚷着要“报仇”。

果然，一到榆树湾，队伍安排好驻地，各乡团总就捆着送来了43个老实乡下人。于是，将人犯连夜过堂、打板子、画押、取手模，第二天一早就簇拥着其中的二十七个到市外四坪把头砍了。接着又杀了五人。以后便是成天捉人，但却不必他们亲自去捉，照例一切犯人大多数由各乡区团总地主送来。被捉人犯，如果愿意出钱交纳捐款，便取保释放；没有钱的穷人，或是仇家乡绅出钱活动必须杀头的，就随便找上一个罪名拉出去砍头。既然“剿匪”就必须杀人，杀人又正可以弄钱，于是一边鼓励乡绅团总抓对头仇人，一边再抓团总“吊肥羊”。又花钱雇当地人当侦探。每

逢赶场时，这侦探便到市集热闹人群中去，指定谁是土匪派来的奸细，然后便捉住了略加审讯，随后便牵到赶集人来往较多的桥头，斩首示众。沈岳焕所属的这支军队共在榆树湾驻扎了约4个月，先后杀了近2000人，为当地人留下了一笔结算不清的血账。

四个月后，沈岳焕所在的部队移防到了离树湾不远的另一个地名怀化的小镇。因为沈岳焕读过书，勉强可以写些东西，而那时填造枪械表正需要一些写字的人，使得他有机会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于是他便成了上土司书，在书记处。因为人小，被军中熟人、同事称作“幺师爷”（幺 y o 凤凰方言，意为“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这位幺师爷便在人生的浪涛中沉浮。

就在沈岳焕被升为司书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他来到了司令部，军法长、秘书长、副官长正陪着司令官搓麻将。见沈岳焕怯怯地从门口挤进来，秘书长说：

“哈，我们的幺师爷来了。”

坐在司令官下手的军法长名叫肖选青，是沈岳焕早就认得的。每次人犯连夜过堂，戴着墨镜，高坐上面主持审讯的就是他，而在旁边整理记录以供军法长存案的便是沈岳焕。据说他很有学问，每次临到杀人他却总是马马虎虎宣布一下犯人的罪状，在斩条上朱笔一挥。没等犯人押出大门，他便急匆匆地跑出后门，

穿过菜园，抄捷径抢占离杀人桥头较近的土墩，欣赏杀人时那“有趣”的一幕去了。可是此刻，军法长却满脸堆笑，和气地问：

“幺师爷，你叫什么名字？”

“沈岳焕。”

“哈，岳焕，岳焕。焕乎，其有文章！”他摇晃着脑袋，拖着私塾先生念古文时的那种腔调，“我看，你就叫从文吧。”

从此，沈岳焕就变成了沈从文，我们对他的称呼也改过来了。

“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秦伯》，为颂扬尧功德之辞。意为其功业文章，巍巍焕然。此处的文章乃是指经天纬地的事业。可在当时，沈从文不仅毫无事功，即便是狭义的小文章也还没有入门。

怀化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沈从文随队在这儿一住便是一年零四个月。军队在这里无事可做，便依旧玩起了杀人的“游戏”。在这期间，他们又杀了200多人。每次人犯抓来后，照例是先过堂。为了逼出口供，常常是不由分说，按倒便打，不说的话，按倒了接着打。打板子是最轻的，他们还用木棒打犯人脚上的螺丝骨，几下就敲出骨髓来；又用香火熏鼻子，烧胸肋；又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将犯人的脚扳断。犯人受刑不过，为了减少些痛苦，

便胡乱招些口供，沈从文便在一旁录供，把犯人胡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士兵便把那犯人手掌涂上墨，拉住在公文末尾处按个手印。这些东西最后还由沈从文整理交给军法长存案。

过堂多在晚上，第二天一早便是杀人。那些据说很有学问的副官、书记官、军法长，全都急匆匆跟着士兵跑去观看。看完回来，便是议论杀人，吃着肉、喝着酒，谈着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的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其他时节的种种杀戮故事。每有新的犯人被处决，他们的话题便换了过来，先前的那个便不再提起。

每次听到他们议论，沈从文的心里就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杀了人，即刻就忘了。杀人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游戏而已。虽然刽子手回营磨刀时，夜里总要买一百纸钱为死者焚烧，那也只有一种“规矩”，而非心生悔意。他想起白天见到的一幕：几个从乡下归来的士兵，夹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挑着两颗人头。不用问，这人头是孩子的父亲或叔伯的无疑。后面的士兵，或押人犯，或挑衣箱，或牵牲畜……。沈从文心里有点难过，可为什么难过，他却无法想得明白。

不久，在沈从文住处旁边建了关人犯的木栅栏，关在里面的人犯交给沈从文几个人看守。这些被关的人多是“肥猪”，需要他们交出一笔钱来，然后这些

有钱人便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一天，这里面关进一个为仇家陷害的年轻人。他的祖母曾许配给仇家，后来毁了约，两家为这事以武力相拼，各自死了许多子侄。仇家遵祖上遗训，要拿他报仇。由于这年轻人为人极和气，经常分东西给沈从文等人吃，又逗着他们玩，于是不觉相互间亲近了许多。既然有了交情，又事出冤枉，大家便替他到上司处说情，结果上司同意让出100块“乐捐”放人，并答应让他回家稍作准备，就来队伍上当兵。谁知回去后竟被仇家暗中杀了，这件事使沈从文很伤心。事过不久，有一个什长拐枪逃走，被捉住以后砍了头。曾帮他逃走的三个士兵照规矩也该死罪，营长饶他们不死，各打五百，送进牢里，算是“运气”好。

大约是在驻防榆树湾的时候，沈从文和他的堂哥沈万林分到了一起。沈万林大沈从文七岁，是个少尉级的弃目。沈从文的起居饮食及其他一些事均得到他的照料，每天早晨5点，他都要去叫醒沈从文：“快起来，快点！点名了，你听号音。”闲暇时间里，沈从文擦完了枪，有时便拿起笔来学写楷字，沈万林便在一旁指导。他临过黄山谷的字帖，从他那里，沈从文知道了陆润庠、黄自元以外许多书法家的名字。

沈从文十分羡慕他的那套少尉军服，在上面生出许多的幻想。平时军队里官兵军阶的不平等早已使从

文感到了许多委屈。军官对下级的傲慢和下级士兵的卑微使他幻想着有朝一日他也能成为军官。虽然见了上级仍然免不了要敬礼，但至少可以用获得的尊敬，将受到的委屈扯平。可是沈万林总是很认真地劝他：“一个弁目，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作，不值得你眼红。你应该成为副官长或更像样一点的人。发狠一点练字，将来你会成为名家的，不单可以卖钱，还……”这话很让沈从文感到振奋，于是他便发狠劲练字。每天空闲时，周围的人们有人闲聊、有人赌钱、有人蒙头大睡，他却在一旁摊开一本字帖埋头练字。

沈从文刚从副兵升为司书时，书记官很瞧不起他，常常挑他的刺，故意找碴。事后沈从文便去找堂兄诉苦，沈万林咬着牙，极力掩饰自己为沈从文所抱的不平，劝说堂弟：“你要学会忍耐，不然你会吃亏的！哥当年也是这么忍过来的。你要自己努力！”

大约一年以后，沈万林奉命押送600块军饷回凤凰，随身带了些钱，还有给母亲的戒指，给妻子打的金耳环。沈从文托他带了个包袱回家，里面有不能再穿的衣服，以及每日临摹《支麾碑》积下的40多张大字。与他同行的有陈士英兄弟和唐怀仁以及一位会赌钱的痞子副官。但却没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是兄弟俩的诀别。那陈士英兄弟俩与痞子副官有仇，商定在路上找机会报仇。行至马鞍山时他们下了手。由于担

心沈万林告发，就下狠心将另外两人也一并了结了。就这样，沈万林带给母亲和妻子的金饰成了自己的殓葬费。沈从文托他带回的大字，母亲怕见物伤心，终于全烧掉了。

沈从文调到秘书处后，除了伏案抄写公文、习字，兴冲冲地跟着别人去看杀人外，还有的是空余时间，但他却不曾想到书，而且也确实没有什么书可读。那些听说很有学问的人和没有什么学问的官员们成天只是陪司令官打牌、谈天、喝酒、抽鸦片。士兵的生活也大抵如此。在这种时候，沈从文总是默默地走开，他对这些东西并无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讨厌，他喜欢到外面去另寻相宜的去处。

在春秋时节，他会邀上几个副兵，上山采药、摘花、寻找各种山果；夏天，他常常独自跑到离住处不远的的一个风洞里，享受凉风拂身时的那种快意；遇上刮风下雨的日子，外面不能去，他便呆在营房里描摹祠堂上的木雕画。有一回，沈从文描了一幅“赵子云单骑救主”，贴在墙上，惹得那些小副兵们哄然叫好，要沈从文给他们每人都画上一张。最让沈从文得意的是邀上几个士兵，上山条竹做箫。然后四五个人口中各含一支，并排从怀化镇那条独街上走过，“呜呜喇喇”地一路吹进营门，招惹了許多人跑出来看热闹。

熔铁厂和修械处也是沈从文常去的地方。他发现

熔铁厂时就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从此，他便常去观看这地方古老的冶铁流程。每当铁汁快要熔化时，沈从文总要抢着帮人拉风箱，听着呼呼的风吼，看着炉口喷吐的碧色火焰，他的心跳也不由地轻快多了。

沈从文还常到修械处去，时间长了，便成那儿的熟人，和主任关系也不错。入冬后，他们常常在一块围着一大钵狗肉喝酒。一面吃喝，一面谈狗肉如何补人，吃了以后不怕冷。逢上那主任喝得兴起的时候，他便训斥徒弟：

“没出息的东西，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冷？”随后又大喝一声：“有种的跟老子下河泅水去！”

几个徒弟便一齐扒光衣服同主任下河去，沈从文也不甘丢脸，一同跟着去。一伙人嘻嘻哈哈乱浇一阵水，再光着上身跑回来。尽管每个人冷得上下牙齿作对儿格格厮打，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却不缺少强刺激下生命能量获得发泄后的那份畅快。

沈从文还有一手“绝活”——炖狗肉。山民出身的军人，无论官兵，均有吃狗肉的嗜好。为了取乐，他常瞒着那些一块吃饭的“长”字号人物，自己出钱买一腿狗肉，炖出极佳的狗肉砂锅来。到吃饭时便出其不意地让副兵端上桌子，去收获每人脸上露出的惊讶。其实那些军官见沈从文提着狗肉跑来颠去，已清

楚他演的是哪出戏，此时却故意装出事出意外的样子。沈从文知道他们的做作，却又喜欢这点幽默作为生活的佐料。他每月领了很少一点薪饷，也不知道如何去花。既然炖狗肉可以收获若干乐趣，他也乐此不疲，只管将钱花去。

军队之中多是些粗野之人，而有一天却来个新上任的秘书，小小的个子，白净面皮，穿青缎马褂，举止十分的斯文。他叫文颐真，一来便到各“长”字号人物处拜会，开口便“多多关照”，像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样子。他待人彬彬有礼，即使对副兵说话也轻声细语，使沈从文感到十分别扭，他觉得文颐真有些做作。

也难怪沈从文有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湘西，军汉们之间说话非常粗鲁，部中上下并不讲究什么礼节，不管说到什么人，总是说：

“那杂种，真是……”

这种辱骂常被认为是亲切的表示，言语之间有了这类语助辞，大家谈论就仿佛亲爱了许多。小点的叫小鬼、小屁股客，大点的就喊吃红薯吃糟的人物，被喊的人从不作兴生气。可是那姓文的秘书却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当只有秘书处的几个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他见沈从文说话必自称“老子”，便摇了摇头问：

“啊呀呀，么师爷，你人还那么一点点大，一说

话也老子长老子短 ！”

“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

可是看看他那和气的样子，沈从文倒有点害羞起来，便解释他的意见：

“这是说来玩的，并不损害谁。”

那秘书官说：

“莫玩这个，你聪明，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好多东西可学！”

沈从文把头一偏：“那你给老子说说，老子再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

因为沈从文一面说话一面看他，所以凡是说到“老子”时总不得不轻声一点，两个谈到后来，不知不觉就成要好的朋友了。文颐真便给沈从文讲述了在外面见到的种种：火车、轮船的叫声，电灯、电话的样子，英军美军衣服的式样，鱼雷艇、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仿佛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心里起了一种朦胧的向往。过了一些天，文颐真将行李箱打开，晾晒箱内衣物。沈从文在里面看到有两本厚书，字非常细小，却异常厚实，封面上写着“辞源”两个大字。看着沈从文发呆的样子，文颐真说：

“小师爷，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且问我不拘什么一样古怪的东西，我立刻替你找出来。”

沈从文有点不信，便要他找诸葛孔明卧龙先生。

文颐真立即给他查找了出来。沈从文既觉惊奇，又十分快活，对这本宝书爱不释手。文颐真问他看过报纸没有，沈从文回答：

“老子从不看报。”

文颐真却从那《辞源》上翻出“老子”一条来，原来那老子却就是太上老君，真有的人物。

沈从文忽然对书报产生了兴趣，便和书记另两个人每人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这报纸共订了两个月，沈从文在那上面竟也学了生字。最使沈从文神往的便是那两本《辞源》，可文颐真却极爱惜，不愿轻易示人，沈从文只能从别人那里借《西游记》、《秋水轩尺牍》看。偶尔，文颐真也让他翻翻《辞源》，在那上面，他才懂得“氢气”、“参议院”、“淮南子”为何物。

这时，湘西联合政府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起初的时候第一军由田应诏节制，此人治军无方，张学济的第二军实力尚厚，故沈从文所属的第一支队尚能占领芷江东乡一带有优势地位的防地。而此时田应诏将指挥权交给了手下一位团长陈渠珍，此人头脑新，又能干，第一军很快军力大振，而张学济却在军事和财政上困难重重。1919年底，陈渠珍率军直通怀化，第二军感到压力极大，不得不向沅陵方面撤退。其时正值隆冬，第一支队回到了沅陵。到沅

陵后，第二军仍然呆住，不得不以“援川”名义，开过川东去就食。由于沈从文年龄还小，就被留下来，连同几十个老弱官兵，在后方的留守处，办点勤杂事。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春天夏天过去了，且又重新过年了。可是第二军的日子却不好过，一到川边便与当地民众接上了火。8月间，队伍来到鄂西来凤，又与当地“神兵”和民兵发生冲突。一个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来凤的“神兵”和民兵乘第二军官兵熟睡之际，手持斧头、菜刀、锄头，潮水般涌入兵营。全军除一个团先行过龙山布防外，自参谋长、秘书长、军法长、旅长、团长、营长以下官兵，全数被杀毙。这支杀人以万计的军队，终于没能逃脱命定的厄运。那个文静平和、嗜书如命的文颐真，也惨死在这场灾祸中。尽管和文颐真相处时间不长，沈从文却感到他在自己的生命留下了极深刻的痕迹，难以抹去。

沈从文由于留在了沅陵，躲过了这场劫难。但第二军既已覆灭，留守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920年8月，沈从文领了遣散费和随身护照，回了凤凰的家中。

沈从文刚独步进人生，便被置于荒蛮的世界。生命在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生与死来得太突然，全不由自己作主。人们的理性世界一片荒芜，死的无声死去，活下来的也如行尸走肉。被杀的人愚昧，杀人者也极

愚蠢。不明不白地杀人与被杀，却被认为“近情合理”“照习惯办事”。到沈从文意识到这是“许多人类作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应当是以后的事。然而这一份血的经验掺到他的生命里，却再也无法抹掉了。

二、玫瑰色的骗局

沈从文被遣散回家以后，在家呆了不到半年，便实在住不下去了。家里的景况与两年前出门当兵时相比，更显艰难。父亲仍然没有回家，哥哥北上也还没有回来。田产已经典光，家里正坐吃山空。母亲成天愁眉苦脸，不得已对外放出口风，说愿以合适的价钱将房产卖出。而这在地方人眼里，是要被看成“败家子”的。而其时沈从文已经快18岁了，较以前是懂事多了。看着家里一天天衰败下去，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成天在外面野了，他下决心出去找一份事做。家里呆不住，军队里又不能再去，只得别谋生路，沈从文决定到沅州去看看。

沅州便是当时的芷江，地处湘川黔边境的要道，机会自然较多。再者沈从文还有一些亲戚在芷江很有地位，凡事可以得到他们的照顾。沈从文出门的时候正值大雪，山荒雪深。走了四天，才到达芷江。他暂住在刚从县长任下来的五舅家里，等待机会。

不久机会便来了。沈从文就由他安排作了那小小警察所的办事员。办事处设在旧县衙内，沈从文每天抄写违禁处罚的条子。隔壁是个典狱署，每夜皆可听

到老犯拷掠新犯时新犯的呼喊。警察所里有些抓来暂时未曾发落的偷鸡摸狗的小贼也寄监在那里，每逢黄昏收监时，沈从文照例跟在一名巡官后面，一手捧着点名册，一手提盏马灯，去典狱署清点这边寄监的人犯。

不久，警察所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沈从文便兼任收税员。芷江在湘西是大码头，地当官道，过往人多，商业兴隆。肉行每天都要杀20头猪和一两头黄牛。沈从文每天填写税单，有时也跑出来到各个肉案前查验。因为这个职务，沈从文每天可以见识许多事情：可以走过那座长约400米的大桥，到对河黄家街去，有机会将芷江城各处都跑到。

除了作警察所长的五舅，沈从文还有一个姨父在当地是个大拇指人物，有钱，有势，从知事到任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有得罪。他的这位姨父便是熊捷三——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七弟。

由于是姑舅亲，沈从文的舅父和姨父过从甚密，两人在一起每天都要作诗，附庸风雅。沈从文虽不会做诗，却学会了看诗。沈从文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去看他们作诗，诗成后便帮他们抄诗，工作得很有兴致。因为盼望所抄的诗被人嘉奖，他便开始写小楷字帖。

由于空暇的时间仍然很多，当平日无处可去，或

来抄诗而又无诗可抄时，沈从文便在熊府中四处观看。最能吸引沈从文的，是客厅楼上的书屋，那里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成了他的好朋友。书箱里有一套林纾翻译的小说和十来本白棉纸印。1921年整整一个夏天，沈从文陆陆续续读完了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等作品；从那印谱上，他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款识。

沈从文很喜欢狄更斯的小说。他发现书中所述世事的艰难和那些坠入困境的世家子弟所作的种种挣扎，与自己的种种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随着书中人物命运的演变，耳边仿佛响起一曲哀婉伤感的音乐，与沈从文心中的情感共鸣。他感到自己与书中人物命运的相通。看到书中人物多有一个好的归宿，他不由地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他曾经做过的将军梦。但此时他已不会再想去从军了。在军队中的亲人和朋友一个一个相继死去，去得那样平常，又是那样触目惊心。他以为他不能在部队那样活下去，他不由地在心中聚起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愿望。沈从文不仅从书中人物身上比证自己的命运，也佩服狄更斯叙述故事的本领，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生活现象。即或书中包含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

心的人。”

对书的痴迷使沈从文有了新的想象与向往，也促进他不断地去学习。在熊公馆隔壁有一所熊希龄创办的中学，此时已停办。在这所学校的图书馆，沈从文翻阅过《汉书》、《史记》及其他一些杂书，以及刊有《天方夜谭》连载的《大陆月报》。

尽管还是特别爱玩，但沈从文办起事来却很认真，收税工作有条不紊，诗也抄得不错，所看过的一些书又部分疏导了他身上的野性，沈从文在当地给人一种好学上进的印象。在几个年长的亲戚和本地绅士眼里，沈从文算得上懂事明理有作为的角色，就连他的那位姨父对他的能力也极赞赏。几个月后，作警察所长的五舅逝去，屠宰税收改由本地团防局征收。新机关考察原先的税收工作，沈从文得了个“不疏忽”的评语，得以继续工作下去，作了新机关的收税员，月薪也由二千文加到十六千文。此时，母亲在凤凰已将家中的房屋卖掉，剩下约三千块钱。既把老屋售去，又无颜在本城租房另住，听沈从文在芷江事做得很好，有些出息，再加上芷江亲戚又多，母亲便带着沈从文的九妹来到了芷江投奔儿子。卖屋所得的三千块钱全数存入钱庄，交由沈从文经营。母亲在过去因胡闹而无法管教的儿子身上，从新燃起了希望。

现在沈从文聪明能干，又有一笔钱，该算是个小

绅士了。本地几个有钱有势的绅士财主，都打量着要沈从文作女婿。就连沈从文的姨父也盘算着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沈从文，他曾不止一次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沈从文作过暗示。如果命运中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沈从文或许会在芷江终了此生，作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主或乡绅，中国也便少了一个杰出的文人和考古学家。可是后来沈从文生活中一段小小的插曲却把他推到了另一个世界。

税收职责新属的团防局，是一个商会性质的机构。在这里，沈从文认识了十来个绅士，同时还认识了一个白脸长身的小孩子——马泽淮，并同他十分要好。有一天，马泽淮邀沈从文到他家去玩，说他姐姐想见见他。

那时沈从文从那些本地乡绅处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写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年龄也已经到了十七岁。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样子诚实聪明的年轻人，和气地邀他去看他的姐姐，结果会怎样呢？一点不好意思和几分得意，写在了沈从文眉目之间。

从马泽淮家里回来，沈从文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个女孩的影子。青春期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使他陷入了一个年龄相当的女孩的诱惑。他以为，那个名叫“爱情”的东西，此时正在自己心里发芽生根。

沈从文为那女孩子神魂颠倒的样子很快就辗转传

扬了开去，不久就被一心希望沈从文作自己女婿的熊捷三和几个有钱绅士知道了。他们都劝沈从文不要这么傻。终于有一天，熊捷三将沈从文母亲请到家里正式认真地给沈从文议亲。熊捷三提出了四个女孩——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儿，其余三人也是出自名望之家。

老实说，四个女孩无论相貌还是家境、教养都较另外那一个强得多。可那时沈从文却自以为爱上了另一个女孩，且相信马泽淮的谎话，以为那女孩也爱着他。而此时他正迷恋于男女间的痴心钟情，便摇了摇头：

“那不成。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得照自己的计划去作。”什么计划？真只有天知道。

沈从文的第一次议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这一顷刻的选择，几乎改写了沈从文此后一生的命运。

就在给沈从文传递诗笺期间，马泽淮开始向沈从文借钱。他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借明天还；后天借，大后天还。这样无数次借还之后，沈从文发现自己的那笔钱少了一千块左右。任沈从文用各种方法算来算去，竟算不出这钱究竟哪里去了。更糟糕的是那马泽淮再也不见踪影了，那件事情不消说也到了结束时节。

沈从文明白自己受了骗。那一千块钱连同自己的“爱情”，全进了乌有之乡。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更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他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便给母亲留下一封信，连同在钱庄存款的票证

也留在家里，然后裹起一些换洗衣服，搭上一条开往常德方向的船，悄悄地离开了芷江。

三、凝眸人类的智慧

船到常德，沈从文上岸寻找宿处。常德不是这次出走预定的终点，他只想在这里转一下船。世事仿佛总是带有许多碰巧，这一回沈从文又在常德遇上了一个叫黄玉书的表哥，他大舅的儿子。从交谈中沈从文知道表哥从常德师范学校毕业后，跟随大舅跑过北京、天津许多大地方，各处找不到事作才回常德等待机会的。一说，再加上表哥极力挽留，沈从文便留了下来，和表哥住在了一起。

常德的事也不容易做。两个人名为等机会找事做，实为本地人所说的“打流”。每天除了在客栈吃饭、睡觉，便是到常德的大街小巷、河边码头各处闲逛。

真正吸引沈从文的是那条长几里的河街和码头。每天沈从文都要在那条河街上走一两个来回，看小孩子打架，军队放马，染匠下河漂布，听卖糕的敲竹梆、卖糖的打小铜锣。他还喜欢站在码头上辨别沿岸停泊的各式各样的船只和各种不同气质、禀性的弄船人。他在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他仿佛从中同样得到了一些生活的意义。

眼前的景物人事并没有使他忘却他出走的那种蠢

事，他便写了些充满忏悔和自责的信回去，请求母亲的宽恕。母亲知道他并不想自杀，便来信安慰他：“已经作过了的错事，没有不可原谅的道理。你自己好好地做事，我们也就放心了。此时的沈从文似乎将世事看穿，书也不读，字也不写了，诗更是无心再作了。

沈从文出来时并没有带多少钱，在常德既无事作，坐吃山空，很快便不名一钱了。欠小客栈钱太多，他便再也不好意思住下去了，便想去找些事做，于是他又想到了军队。

其时在上游的清源县有一个清乡指挥部，属于他本地的军队，那指挥官是贵州人，所有的高级官佐却大半是他的同乡。有朋友介绍他去做事当然会容易些。当时的贺龙任支队司令，归指挥部统辖，沈从文便去找他。得了个拿九元干薪的差遣，只一月便不干了。在那里，他碰到了从保靖总部派来作译电的表弟聂清。再看这支当年的“清乡”军队，面貌也大有改观，上下官兵极有精神，纪律又十分严明，使得沈从文入伍当兵的愿望又强烈起来。恰好此时有一只运军的帆船要从常德上行到保靖去，押船的又是沈从文哥哥的朋友曾芹轩，表弟聂清也正要随船回本队。由于亲眼所见驻防桃源军队的变化，对陈渠珍又怀了敬佩，沈从文便决心跟船去保靖，再在军队里谋一碗饭吃。但在

他心眼里，他更希望能在陈渠珍那儿当一名差弁。

旅途虽然辛苦，却不寂寞。那姓曾的很会说故事，常听得沈从文神往心移。曾芹轩那时年纪不会过二十五岁，却已赏玩了四十名左右的黄花女。他说到这点经验时从不显出一分自负的神气，不骄傲，不矜持。他说这是他的命运，是机缘的凑巧。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都仿佛各有一份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语言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齿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不至于失去她当然的点线，说得对，说得准确，就多数得口于这朋友的叙述。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这朋友最爱说的是粗野话。在我的作品中，关于丰富的俗语与双关比譬言语的运用，从他口中学来的也不少。”（出自《从文自传·船上》）

目的地到达后，沈从文住在一个做书记的另一个表弟那里。无事可作等事作，照本地话说为“打流”。这名词在吃饭时就见出了意义。

当时沈从文的熟人很多，地位却很卑下，帮不上他的忙。而那些军法处、参谋处、秘书处以及其他的地方的高级办事员也不愿帮忙。因为一则作护兵的多用小苗人和乡下人，做事吃重点。用亲属中子侄，做事可靠点。二则他们认识沈从文的父亲，不好意思让

沈从文干护兵这些小当差。

沈从文既住在秘书处，几个月后和所有的书记也就混熟了。有书记较忙的时候，沈从文便帮着写点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有一次他正在写一件信札，过来一个高级参谋见他面生，便问他是什么名义。沈从文以为要受责备，就承认没有名义，只是在这儿玩，帮他们点忙。书记官过来圆场，告诉参谋说沈从文很能干，帮了很多忙。那参谋问清了姓名报上去，当天沈从文就作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沈从文后来知道那参谋是自己小时同伴熊澧南的哥哥。

饭碗有了着落，沈从文也干得很有成绩。字写得好，对公文又很在行，不久就加薪到六块。沈从文因写字而“发迹”，更加发狠练字，将每月一点薪水攒起来，五个月内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因为工作能力比同事强，沈从文很快地又被调到了参谋处服务。

十个月很快过去了，然后便传来了川军司令汤子模请陈渠珍派四个团到川东填防的消息。消息证实以后，沈从文通过参谋处的同乡跟着部队去做文件收发员，干薪九块钱一个月。带兵的司令是一年前驻防桃源的那位张姓指挥官，贺龙也以警卫团长的身份前往。当时沈从文所考虑的一是希望和上司多接近，以便上司认识他的长处，为自己挣得一份好的人生安排。另外还有一个秘密理由便是他想去看看巫峡，那儿离驻

地不太远。

出发的时候，沈从文随身带着的，除了一些生活用具以外，更有好几本字贴：褚遂良的《圣教序》、王羲之的《兰亭序》、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以及《云麾碑》，此外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在沈从文看来，还是很动人的。

入川后，司令部驻扎在龙潭，沈从文任机要收发员，负责收发文件，然后加以登记，文件按性质分平常、次要、急需三种，又分收、发两项，再加一个总帐，共七个簿子。每晚沈从文都要送参谋长转司令检查，画押后再抱回来。

司令部设在市中心的戏楼上。由于文件保密的缘故，沈从文住在戏楼的最后一角，倒过来隔壁是司令官的差弁，然后是参谋长和秘书长、司令官、军法长。楼上、楼下、戏台上均有各处或卫队驻扎。各地方均贴上白纸条，仿虞世南字体写出部门名称，全是出自沈从文手笔。在他的房里，更是贴满了字。他还贴了些字条，上书“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他知道写字出名的，死的有钟繇、王羲之二人，活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沈从文以为只要赶过了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

空闲的时候，沈从文也和以前一样，喜欢出去走走，四下里看看。镇边有一条小河，是沈从文常去的

地方。独坐在河岸的高崖上，看那船夫背了纤绳拉船只上滩。船夫们“身体贴在河滩岩石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同时使人得到快乐和忧愁”。还有一个湘川边境远近闻名的龙洞，洞里流出一股寒流，长年不竭。水极寒冷，手一入水，骨节就疼痛麻木，失去知觉。沈从文差不多每天必来一回，在洞中大石板上坐坐半天，听水吹风够了，再用一个大葫芦贮满了凉水回去，款待那些同事朋友。

由于发现司令部的参谋长是个性变态狂，极好男色，沈从文感到很害怕，便想着尽快离开。不久有一个机会转湘南，他便领了护照搭小货船回去。经过了无数恶滩之后，沈从文又回到了保靖。

从川东回湘西后，沈从文的缮写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便被调到那个治军有方、足智多谋的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了。

这份工作可以说是沈从文生命中一个转机，使得沈从文对于整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有了一个从容的机会去接近，去认识。

平时沈从文住在军部的会议室里，房中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里面收藏着陈渠珍的一些“宝贝”：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与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和一大批碑帖，不久又添了一部《四部丛

刊》。陈渠珍平日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诩，每日必要学习一段时间，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总是让沈从文替他作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全由沈从文来作。此外他还得登记旧画与古董，汲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或是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时，他得一一查出记下，这同时他便学会了许多知识。由于经常替陈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成天把书翻来翻去，竟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

由于职务的原因，沈从文不能随便外出。日子一长，便显得过于清闲了。无事可做时，沈从文便把那些旧画一幅幅取出挂到墙上欣赏，领会其中妙处；有时翻阅《西湖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籍，与铜器上的铭子比较鉴别，估计它们的名称和价值，偶尔也查阅《四库提要》，找出一部书作者所处的时代。这些工作都于沈从文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在后来的自传中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沈从文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宽泛熏陶。他的历史、文学

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底，便是此时扎下的。

内心精神的变化，引起了沈从文表面生活的变更。他同一些老同事已经谈不来了。他感到很寂寞，需要几个朋友听他陈述酝酿在心中的十分混乱的感情。他需要人来启发和疏解这份感情，可熟人中却找不到这种人。可是上苍似乎特别偏爱他，不久便为他安排了一个。这个人姓聂，与熊希龄同科进士，是沈从文的一个姨父。

这位老先生是陈渠珍的先生，处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风正炽的时代，无论旧学、新学都很有根底。老先生知识渊博，而且非常有趣，常常会 and 沈从文讲“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这些分属中外东西不同来源的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将沈从文带入了一个虚静寥廓的思辩领域，展现出用来疏解自然、人生万事万物的不同因果关系。沈从文时常提出很多问题，老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作出回答，这种谈话使沈从文感到很快活。但这么一来，他的幻想也更宽、寂寞也更大了。

这时，由于国内军阀间暂时的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得极响，各地的报纸正热烈地讨论“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这些国内建设问题。陈渠珍受时局影响，草拟了一个“湘西自治”计划，经过几次各县乡代表商定后，便付诸实施。办学校、

建工厂、设报馆，一时湘西呈现出一些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来。由于筹办刊物需要校对人员，沈从文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沈从文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部中有文件抄写时，还要转回部中。

调进报馆后，沈从文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起。这个青年人来自长沙，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较早，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他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带来，而沈从文却从军部会议室搬来些字帖和古典诗集。两人同在一个房里睡觉，同在一盏灯下做事。他看新书时沈从文便去看他的旧书，互不相犯。不久，两个熟络了以后，沈从文便打破了这种界限。

一天，沈从文看到对方手里的书封面上印有一个赤着上身的人像，便问是什么书，那工头回答是《改造》。沈从文又问写的是什麼，那工头仿佛很吃惊，睁圆了两眼说：

“唉，伢俐，怎么个未朽(差劲之意)？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

“我就知道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

“新的呢？”

“我知道随园女弟子。”

“再新一点。”

沈从文摇摇头，不再说话，他实在不知道再新一

点的还有谁。那工头翻开那本《超人》，将一篇与书名同题的小说指给他看了。之后，沈从文又看了他的一卷《创造周报》。看了一会儿，沈从文仿佛明白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文言文用“也”字、“焉”字结句的地方，白话文用“呀”字和“啊”字；文言文叙一件事说得越少越好，白话是越多越好。明白了这点区别以后，又去问那工头。那工头觉得好笑，却也说不出更多的区别，只说白话文最要紧处是看“思想”。但沈从文却不懂什么叫“思想”，又不好再问，倒疑心自己真有点长沙话所说的“朽”。

沈从文觉得自己应该很感谢那印刷工头，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新书，沈从文虽然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上，同一片天空下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起初的时候，沈从文觉得他们老是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产生了反感。可为时不久，他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他向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

沈从文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他开始崇拜他们。他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情，

一动起笔来就写一大篇，还写得那么好。

在新思想的启发下，沈从文的思想产生了变化：“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在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的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沈从文用十天的薪水全都买了邮票，请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转交给了“工读团”，算是“作了一次捐资兴学的伟大事业”。

在报馆作了三个月的校对以后，因军部缮写缺人，陈渠珍又将沈从文调了回来。没想到这次回调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

因为军部积压工作较多，沈从文没日没夜地傻干，一晚抄了100件命令。正值春夏之交，气候变化无常，沈从文染上了伤寒。这病来得凶猛，病情急转直下，在半昏半醒的状态下度过七天，总算没死，硬是从鬼门关的门缝里溜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这一病，沈从文在床上支撑了40天，多亏满振光、郑子参、田杰、陆四个人照看守护，才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一天天好起来。

沈从文的病刚刚脱体，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他的几位青年朋友中间。先是陆 因为泅水淹

死在当地的大河，这是沈从文病刚好时的事。以后便是满振光作了个小军官带兵在广西江西各处打仗，在桃源县被人打死了。那郑子参从黄埔毕业后参加东江作战，也消失了。

陆 的死给了沈从文很大的震动，他不由地开始思考起自己人生的安排来。这件他从未想过的问题，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厨房，他痴痴地想了四天，自己秘密地想着，也不和人商量，最后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作出自己的抉择：“好坏我知道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义些。”“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呢？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我准备到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

恰好此时湘西正轰轰烈烈地实施“乡自治”决议案，派学生出省或在本省学习。借着这个机会，沈从

文便把那点意见和打算怯怯地和陈渠珍说了。陈渠珍同意了他，并给了他一些鼓励：

“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去。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于是，沈从文拿着陈渠珍写的手谕，到军需处领了27块钱，回到了家中。

几天以后，沈从文辞别了父母，带起一个小包袱，向北京进发。这一次，他终于跨出了对于他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开始了无法逆转的生命历程。这意味着他即将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汇入“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洪流。

一路辗转，19天后，沈从文到达了北京。在前门广场上，他举目四望，只见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巍然耸立的前门城楼。

——“北京好大！”

他知道，自己“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法毕业的学校，来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第三章 索解人生的方程式

一、北京街头的“乡下人”

一个来自蛮荒之地的“乡下人”，突然站在了北京前门的广场上，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新奇？茫然？抑或是一种手足无措？这三者之于沈从文，都有。然而，无论如何，他首先得找个住处。正当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一辆排子车停到了他的面前。

在北京，这排子车不是供人坐乘，而是专门用来拉猪的。而当这个车夫问沈从文要去哪儿时，沈从文这个初来乍到的“乡下人”，还来不及入境问俗，便坐上了这辆拉猪的车，向一家小客店奔去。

那时，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几天以后，沈从文打听到他们的住处后，就立即找上门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来北京，作什么的？”田真一关心地问。

“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噫，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作，

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一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兼施得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出息！”

“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传染性的，……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了沈从文这一番话，田真一心里一动，重新打量起沈从文来。几年不见，他隐隐感到沈从文身上起了重大变化。——他不再是那个淘气逃学的小顽童，不再是在芷江干出丢掉一千块钱一类荒唐事的“败家子”了。不曾料到的是，这个偏处一隅的行伍里的小兵，竟成了新思潮的俘虏，这简直是个奇迹！

沉默了一会儿，田真一诚恳地对沈从文说：“好，好，你来得好。……你这个古怪的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

经验一切。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不久，大姐和姐夫离开北京，回湘西去了。

这时，沈从文已经从那家小客店搬到西西会馆住下了。会馆的管事姓金，是沈从文的一位远房表哥。因此，租金就自然免了。

本来，沈从文来北京是想进一所大学读书。然而，读大学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对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当然也有不需经过考试就入学的，但得凭关系。没有关系的沈从文便不能再作正式升学的打算，独自在西西会馆里，开始了来北京后第一阶段的自学。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出西西会馆，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返回住处。到了冬天，北京的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甚至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仍然穿着薄薄单衣。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沈从文读了许多杂书，如《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等。图书馆不开门时，他便呆在会馆，钻进被窝，看随身带来的那本《史记》。

在这里，他一面阅读各种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又一面充满热情和耐心，阅读用社会人事组成的那本无比充实丰富的“大书”。琉璃厂的古董、天坛的地摊、军阀政府的混乱促使沈从文思索历史、

思索社会。他隐约地感觉到，封建王朝正在分崩离析，社会必须重建！

在保靖时，沈从文曾经从新报刊上获得“文学革命”的印象。他认为，要重建社会，必须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通过文学作品，在国民中注入新的思想和热情。但是，当时的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他默默地叮咛自己，要努力学习，无论前方会有多么大的困难。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这一目标，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既已选定，那么就应当有对于目标的执著、不屈不挠的追求。

接着，因了一位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表弟的帮助，沈从文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住下，这就是银闸胡同公寓。这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的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这次搬迁，对于沈从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红楼边上的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而此时，北大校长就是那位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北大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大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在这些学生中，既有一些纨绔子弟，也有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如陈炜谟、冯至、杨晦等。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外，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卒、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

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而尽管有了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然想成为一名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经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零分。这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写成文章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所有的这些文章，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甚至还遭人的奚落。但是，沈从文并没有气馁。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社会必须改造，而这改造又必须从文学革命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要从外面给社会以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10卷）正因为有了这种深层的、来自生命本身的巨大驱策力，使沈从文没有因为失败而中途罢手，相反，他更执著于文学。而这种执著又可能与他那顽强倔强的乡下人性格有关。

然而，此时正热衷于文学革命的沈从文，在经济上却已经陷于非常困窘的地步。当初他和姐夫第一次见面时，身边只剩下七块六毛钱，而他姐夫和姐姐离

开北京时，仅给他留下两条棉被。起初他还寄希望于陈渠珍的资助，但这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当时，沈从文大舅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筹划香山慈幼院的建设，但也没有能力给沈从文提供资助。于是，在刚来北京的两年半时间里，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经济来源完全断绝的情形中度过的。北京的冬天，寒冷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在沈从文先后的几个住处里，都没有火炉。于是，一身单衣、两条棉被，就是沈从文的全部过冬之物。而吃饭也常是在有一顿无一顿之中度过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可是两年半的时间啊！

在这种日子里，当他饿极了时，他就扎紧腰带，跑到现在的儿童剧院对面——当时那里扎带布棚子，有各种吃食出售——看别人吃饭。他也曾想到过半工半读，但无论使用什么方式，无论条件是多么低廉，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份工作。

在这里，沈从文曾经有两次差点又当兵了，尤其是第二次。一天没吃东西的沈从文来到了天桥，当他看见一支队伍走过身边时，知道前面那个举白旗的是直系或奉系军队的招兵委员，跟在他身后的是准备去卖身当兵的，现在只要填一下志愿书，按一个手印便能领到饭费了。这对饥饿的沈从文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跟在队伍后边。轮到他填志愿书、按手印时，沈从文耳边响起了回音：“既然为信仰而

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这是姐夫田真一临走前的忠告。沈从文心里一紧，这时，因饥饿而失去控制的理智终于渐渐地止住了沈从文混乱无主的情感。在这信念的边缘，他最终没有走回头路。这对于沈从文是多么重要的一次决定。如果他这时参军了，那他以后的历史将要改写，我们也可能看不到《边城》，看不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多只是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多了一介武夫。当然，历史来不得假设，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人生，最关键的就是紧要关头的几步。

在饥饿与寒冷中，沈从文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念，也没有放弃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1924年冬，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了自己的处境。沈从文的艰难处境，终于得到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同情。接到沈从文的信后，郁达夫专程跑来看望他，并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共花去一元七毛钱。郁达夫拿出了五块钱，并将剩下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回到住处之后，沈从文不禁伏在桌上哭了起来。半个世纪后，当他谈起这件往事时，天真而激动地笑了，并说那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郁达夫回去之后，便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表达他对社会黑暗

的强烈不满。在这篇文章里，他称赞了沈从文“坚韧不拔的雄心”，也诧异于沈从文的“简单愚直”，并给沈从文献了摆脱目前困境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到外面找事作，或革命，去造炸弹。中策是返回湖南。下策有两种办法，一是去当兵，二是去偷，最好先从熟人偷起，如沈从文有钱亲戚老H家(H即熊希龄)。然而郁达夫并不深知沈从文，只看到沈从文生活上的困顿，却不明白沈从文是在什么情形下走出湘西，又是为着什么而自甘如此忍苦。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之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了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这篇文章被北大教授林宰平看到了，他被沈从文的艰难处境和坚定的信念所打动，遂给沈从文介绍了一个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办事员，月薪20元。而这时，熊希龄正在北京主办慈善事业，香山慈幼院即由他所建，担任理事长。而令人奇怪的是，沈从文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竟不曾得到和自己有亲戚关系的熊希龄的帮助，去香山任职反而要通过别人介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他1927年写的一首诗《给璇若》和1980年一位美国学者金介甫对他的采访，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他

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拒绝了作为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二是他想从湘西上层错综复杂的网络中独立出来。

然而，在香山慈幼院工作期间，沈从文发表的两篇关于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慈幼院的教务长和熊希龄，因而最终他只好下山了。

在离开香山前后，沈从文先后担任了《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和冯玉祥部秘书处的办事员。而在此期间，北京正处于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时期。即使是反军阀政府的各种政治力量，相互间的矛盾也是极为激烈。这些政治力量都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活动，其间既有庄严，亦有猥亵。而沈从文对这一种迷乱起了一种警觉，他担心卷入这场斗争，会将自己极力追求的人格“独立”失去。他相信自己追求的“文学革命”，需要一种沉默的努力。他拒绝参加任何学生集团和派别，他反感于这种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他声明：

“我并不是为了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活下去。”
(《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10卷)

正是凭着这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沈从文在他的文学道路上的第一阶段渐有所成。

1924年12月，沈从文发表了她的处女作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5年—1927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各类作品170余题。

1926年，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出版，1927年，他的小说集《蜜柑》出版。

沈从文这一段时期的作品，很明显地受了郁达夫将文学当作作家“自叙传”的影响。这些作品都以叙述亲身经历为主，或回忆往事，或讲述目前遭遇，都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沈从文此前的某些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而这心路历程则是一个“乡下人”初到城市的卑微心理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自卑与自尊的折磨和某种心理报复。

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中，作者这样写道：

“……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内心里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怨的自谴。……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冷酷的视线投到我的身上，露出鄙视的神气。”

凄清，忧伤，这是沈从文当时那种卑微心理的真实流露。而这样的作品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而伴随着这极度的卑微心理的，又是强烈的自尊。这对于初入都市的“乡下人”来说，恐怕在当代社会

亦是如此。在沈从文的两篇作品——《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里都充满着对屈辱与压抑的桀傲不驯。

在《第二个狒狒》里，叙述了他在剧场看戏，当“老爷”带了两个小玩物坐上前排，在他身边空座上填上两个“奇丽肉体”时，他禁不住想起有关大腿“圆润好像美玉”、“颈项好像象牙台”一类的诗句，心里起了波浪。写道：

“迦蜜山只在他之前三寸间隔，但给了他欢喜也给了他忧愁：因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时时回过去，牵引他几回想伸手摩抚一次那莹然如玉的象牙台，苹果的香味，使他昏迷如痴……”

“这位不幸的少年，终于犯了许多心的罪孽，在巴特拉并水池的鉴照下，也成了一个卑劣东西了！”

这里真实地表露了作者内心的情欲冲动。而这种对异性的欲求又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在追求中，作者无法摆脱自卑和怯懦。

沈从文这些作品由于真实地描绘了一个乡下人进城前后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再加上他湘西生活的传奇色彩，透露出的真挚情感和天真的自然之趣，因而得到了诸如林宰平、徐志摩的欣赏，开始引人注目。徐志摩称赞他的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轻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

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二、三人行

沈从文之所以在初到北京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活下来，而且做到了初有成效，这除了得益于他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之外，恐怕还与他以独特的魅力所赢得的友谊有关。这种友谊是平等的，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所有给与沈从文关心与帮助的，皆是感动于他的那种对坚定信念执着的、不畏困苦的追求精神。同时，他拥有的那份奇特的人生经历，也是他的多数青年朋友所没有的，他们欣赏沈从文的这份财富，沈从文也从这种欣赏中，意识到了自己拥有的优势。他是在朋友的相互依傍下，获得精神上的支撑，从而走过这一段不易想象的人生道路的。

他的朋友董景天一听他谈起自己的经历和湘西种种民情风俗时，可以彻夜不眠，兴致极高。董景天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乡下人竟在心里藏着那样一个有血有肉、感觉细腻的人生世界，在他的心里，正滋生着一种朋友之间才有的贴近与温情。

而当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工作时，因为住在一间庙堂改成的宿舍里，院前院后荒草野树之间，大白天也有狐兔不时出没，因而一到夜里便有一种《聊斋志异》的故事将要发生的感觉。朋友陈翔鹤得知以后，

竟独自骑一毛驴，似一隐士般来寻找这一佳境。于是，两人便带几个凉馒头、一碟咸菜、一壶开水，来到香山两株名松“听法松”旁的石头上，谈文学，谈人生，谈天说地，谈神仙鬼怪，作那时的文学青年所能作的浪漫之梦。到了半夜，四下一片寂静，冷冷的月光从松枝间筛下，星星点点洒在两人身上。沈从文一时来了雅致，竟从屋里抱出一面琵琶，用他刚学到手的蹩脚透顶的技法，为陈翔鹤弹起“梵王宫”来。

这种友谊是文友间那种浪漫而又清淡的友谊。而他与胡也频、丁玲作为朋友一场的结识、交往，直至30年代初期与二人的“死别”、“生离”，前后长达近10年的悲欢哀乐，才是一曲动人情思的生命乐章。

1925年初，沈从文正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节，突然一篇文章出乎意料地被登在《京报·民众文艺》上，而在此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于是，作为《民众文艺》编辑的胡也频就来看望了作者沈从文。在紧接着的一周以后，胡也频又领着丁玲来看望沈从文，丁玲之所以来看沈从文竟是因为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

丁玲亦是湖南人，和沈从文同是沅水边人，既是老乡，又身在他乡，于是两人便有了许多的话题，并因而有了密切的友谊。

而这时节，胡也频已经爱上了丁玲。由于长期飘

流在外，眼下生活又毫无希望，丁玲便常常想起母亲和夭亡的弟弟。加上正值青春期，对早年夭亡弟弟的思念，潜意识正发生着替代性的对异性爱的追求。胡也频则以“一个新的弟弟”的名义给她送花，而她终无反应。这些，曾经给表哥当过“红娘”的沈从文早已体察到了。

而有一天，丁玲突然回转湖南去了。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的爱的潮汐的胡也频马上南下找丁玲。

正当沈从文因为《第二个狒狒》和《棉鞋》事件被训斥和威胁的时候，忽一日在门上发现一留言条：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面大街 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悉的人。”

当沈从文莫名其妙地来到那儿时，竟没料到是胡也频和丁玲，而在屋内，只有一张双人床。沈从文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三人开始做起梦来。他们想：假若每人每月写三万字文章，得30块钱，就可以自己办一个小小刊物，每周出版一次。还十分认真地商量给刊物起名字。

但这终究只是梦，因为他们都已经感受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的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日，当他们得知沈从文的一篇小说《福生》

发表在《语丝》上，竟至于感动得哭泣。然而这种幸运只是偶尔有之，他们想象中的刊物就总也没办起来。

而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一听说某报要办一副刊，胡也频总不放弃任何努力的机会，“休，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稿费也行吧。”尽管如此，却总是毫无结果。

于是，失望的胡也频和丁玲便只好一起返回湖南。在湖南的胡也频经常寄些小诗给沈从文，而此时正在《现代评论》当发行员的沈从文便将这些诗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这些诗的形式和原稿字迹，都与沈从文相近，编辑都以为这些诗是沈从文作的。他俩都喜欢用硬笔头，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更凑巧的是，丁玲的习惯亦是如此。以至1927年，丁玲《在黑暗中》的各篇章开始发表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也以为出自沈从文和胡也频之手。

想不到三人的这一习惯，在1925年4—8月，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那是丁玲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之前，因上学无望，处境艰窘，而向鲁迅写的求援信。而由于丁玲笔迹类似沈从文，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化名一女

性而向他求援，很是反感，并写信给朋友，将此事发挥。后来当鲁迅知道确有丁玲其人时，心中的疑团和误会，随即冰释，并感到很抱歉。可是鲁迅的这种讽刺和发挥虽然是信中私下进行的，却终究被沈从文知道，于是沈从文也非常生气，加之他那种强烈的自尊，致使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虽然两人之间存在着这一隔阂，但并没有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也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纷纷南下。而此时，丁玲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的文章也由于《晨报副刊》的改组而多了发表的机会。于是三人就都没有南下参加北伐战争。

然而，1927年至1928年之间，随着蒋介石的“清党”和“宁汉合流”，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国政治重心南移，上海的新书业开始蓬勃发展。许多书店、出版社纷纷南迁。其时，沈母和九妹也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

去，上海又依稀露出生存的希望。于是，1928年1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自己先行到了上海。

岂知，沈从文刚到上海二个多月，胡也频和丁玲便也来到了上海。而此时的丁玲和胡也频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卿卿我我，相互间的摩擦越来越多。起初沈从文以为这是年轻情侣间的斗气任性，因而总想极力从中劝解，让人平静下来，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些都起源于丁玲与冯雪峰的“伟大罗曼史”（丁玲自称）。

也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并作为文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

丁玲则将这种传闻归因于沈从文写的《记丁玲》一书中说的三个人“同住”。而沈从文在记丁玲里曾这样写道：

“两个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的新民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然而，“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而实际上，这所谓的“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

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204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所以，这种传闻应当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作为当事人的沈从文和丁玲都否认此事。进一步说，恐怕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也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

就在他们三人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的时候，他们原来在北京就有的创办刊物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起源于胡也频应邀担任《中央日报》编辑，他们商量定办两个刊物——《红黑》和《人间》。《红黑》为胡也频负责，而《人间》则由沈从文和丁玲负责。当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看到杂志非常畅销，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

在这里，沈从文依然坚持其独立原则。既不卷入不必要的文坛门户之争，又不俯就商业利润；既不成为政治的简单“宣传机器”，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而这种独立，尤其是不依附于某一政治派别或经济实力的独立，最终又使《红黑》和《人间》夭折了。在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下，这个悲剧结局是必然的。

梦想既已破灭，可是路依然得走。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做。于是，1929年8月，沈从文独自来到了吴淞。1930年，

胡也频和丁玲去了山东。

胡也频到山东以后，大肆宣传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因而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回上海。不久，胡也频和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动员沈从文也参加。沈从文由于对政治斗争的困惑，还是主张文学不能完全同政治结缘，文学应该向人类的远景凝眸，因而他拒绝了，沈从文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一方面是由于他迷惑于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厮杀；另一方面，他当初出走湘西的目的就是寻求独立，因而，他厌烦任何这一类的集团，生怕丢失了努力争取得来的自由。

而因为这一“隔膜”，三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

1931年，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月17日，胡也频被捕。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事件。胡也频被捕以后，沈从文、丁玲等人曾多方营救，然而无济于事。2月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枪杀于龙华。八九月间，沈从文怀着对死难朋友的沉痛哀思，写下了长篇回忆散文《记胡也频》。1931年秋，沈从文应邀去山东青岛大学任教。1932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时，丁玲已和担任过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同居。自此以后，直到丁玲被捕，再于1934年在报刊上复出，两人不

仅再没有见面，同时也断绝了通讯联系。

三、“只有你有这种魔力”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要他去北京，沈从文没去。而当时，胡适正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沈从文被聘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当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将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袋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灰飞烟散，脑子里徒留一片空白。而上课前，因他自觉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仿佛突然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而这一呆，就呆了将近十分钟。

起初，教室里还有人声，五分钟后，教室里声流逐渐低下去；到这时，满教室却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

十八，面目秀丽，因皮肤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这时，她见沈从文形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很紧，怦怦直跳，血潮直往脸上涌来，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好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女孩。

但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开口说话，又岂料，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十分钟之内他又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态。最终，他只得提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这就是沈从文的第一课。

不知从何时起，选修沈从文课程的那只“黑凤”的身影，飞进了沈从文大脑的屏幕，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张兆和的美貌与沉静，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旌，使他目眩神迷。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窝，生发起爱情的潮汐。爱的潮汐来得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房子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

里的情况。到后来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中，隐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而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的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份量极重”（张兆和：《三姐夫沈二哥》）。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最后决定置之不理，而这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爱她已到了快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的，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开来，说是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后，要她赶快去找校长。张兆和希望胡适能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岂料胡适却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这样一来，张兆和继续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太好了。于是，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

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她从头到尾读完了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长，却被沤热、发酵。不知不觉中，她已经习惯于那些起初让她脸红生气，微嫌卤莽的文字，并且不再怕它。——一份她并未明确意识到的爱，在她的下意识里，正悄悄萌芽。

而张兆和依然是沉默与退避，沈从文则是执着地追求，于是，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一晃即是四年。

1932年夏，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苏州家中，沈从文则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他想起四年来与张兆和的关系，现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了断了，于是决定亲自去苏州看望张兆和。而当他来到张家时，得知张兆和在公园图书馆看书时，以为张兆和是有意躲避自己，于是很懊恼地回到了他下榻的中央饭店。

正当沈从文在生闷气时，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居然是张兆和，只见张兆和对自己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于是，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三号张家。

张兆和之所以来找沈从文，是因了二姐张允和之劝说，甚至连见面说的话都是她告诉张兆和的。二姐允和，心性宽和，专爱成人之美，沈从文对她十分信

赖。沈从文返回青岛后，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2年底，沈从文收到张兆和和张允和姐妹俩的电报。张允和的电报，只从自己名字上取了一个“允”字，而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沈从文一接到电报，心里充满了莫可名状的喜悦。

不久，两人订了婚约，张兆和随沈从文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后来改名江青的女性，而江青则随沈从文写作。不料30多年后，这个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角色，并由于她与沈从文的这一段人生的“偶然”，还播下了沈从文人生道路上的一段传奇的因子。

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段。当张兆和问沈从文：“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沈从文则答道：“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凡事万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治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

沈从文不再孤独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宁静的港湾。

第四章 在困境中崛起

一、丁玲事件

生活对于沈从文并非只有爱情的甜蜜。就在挚友胡也频死后，徐志摩之死、丁玲之被捕又接连给了沈从文沉重的打击。

1931年11月21日，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突然获悉：志摩死了！这消息对沈从文犹如晴天霹雳，沈从文的心弦好像立时被一股巨力绷紧，又立即被猛力所摧折，只觉得浑身无力，目瞪口呆，这感受之于他第一次上讲台可是截然不同。

徐志摩生前对于沈从文的种种关切，历历在目：当初自己投稿无门之时，意外地得到了“志摩的欣赏”，从而坚定了自己走文学之路的决心；在自己为应付生活而艰难挣扎之时，又是徐志摩伸出援助之手。假若没有他和其他朋友的帮助，自己或许早已成为北京街头的饿殍。

想起人生路上结识的挚友一个接一个死去，而自己仍然要在孤独寂寞中继续前行，而不知前方之于自己又是一种什么结局，热泪禁不住模糊了沈从文的双眼。

在沉重的打击之下，沈从文陷入了人生的偶然与必然，理性与情感的思辩之中无法得到解脱。

倘若说志摩之死仅是自己失去一位挚友的打击的话，丁玲之被捕则不仅是如此了。

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之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丁玲马上被秘密逮捕。

丁玲失踪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报刊披露出来。沈从文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来信证实以后，他惊呆了。又一个作为前进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有意设计的圈套。

怒火从心中愤然而起，他要向社会控诉国民党秘密逮捕，屠杀进步作家的非法行径。5月25日，即丁玲失踪11天之后，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

“……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就包含着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他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丁玲女士被捕》，载《独立评论》第52、53合刊，1933年）

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营救丁玲的活动。这些活动，沈从文皆参加了。而这时，社会上盛传丁玲已被杀害，沈从文信以为真，并于6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死难朋友的哀思。

7月，沈从文写下了长篇回忆文字《记丁玲女士》。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该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

1934年，《记丁玲女士》结集为《记丁玲》出版时，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严重删节。

可是，丁玲事实上没有被杀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1936年1月，丁玲开始在《大公报》、《文季月刊》上发表文章，冀望透过作品，向外界发出信号。于是，丁玲的住址立刻被沈从文知道了。不久，沈从文便去南京苜蓿园探望丁玲。而此时丁玲心里，却对沈从文有了芥蒂，她在后来的《魑魅世界·春暖待花开》里有这样的叙述：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戏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

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1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1929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和我母亲住二层楼。1931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11天，即5月25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从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很使我们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6月1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她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

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

关于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到上海一事，丁玲显然把后来的印象提前了。沈从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1936年初的事。而丁玲得知沈从文不肯借用名义接她母亲的事是1936年5月。而且其中事实是否属实，现在也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呢？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胆小，怕受牵连，又

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小？至于路走常德不去看望丁玲母一事，丁玲是听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在纪实性散文《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的旅馆里。更何况，沈从文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家后，沈从文只住了三天，便又匆匆返回北平了。过了不久，沈从文母亲即病逝了。所以即使沈从文未能去看望丁母，在人情上也不至于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他能够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又何至于怕因看望丁玲之母而受牵连呢？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恐怕是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

人世极为复杂，而历史又扑朔迷离。在当时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恐怕个人很难对每一件事作出正确的判断。更何况，沈从文、丁玲同样是人，很难保证自己无任何私心(事实上，历史上又有几人能做到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去责备谁，只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多一些理解便足矣。

沈从文和丁玲的友谊，终因丁玲心存“芥蒂”而埋葬了。但是无论如何，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之间

的友谊，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他们曾经在那样的艰苦岁月里相濡以沫，同艰共苦，而至于最终这种伟大友谊的终结，我们当然应当感到非常惋惜，但友谊是当事双方的权力，是不能勉强的，不能超越于当事人的认识水平的。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则似乎应当从这友谊的变奏与终结中体味点什么，感受点什么，能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所助益。

二、正当盛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接着日军又发动了侵略华北的战争，打开了通往华北的门户。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凡爱国者都已经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年的抵抗忧患能力，已成为了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辞去青岛大学校长之职，来到了北平，着手组织撰写教科书的班子。作为青岛大学教员的沈从文自然就成为了班子成员。同去的还有张兆和、九妹沈岳萌、朱自清等人。此后数年，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开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新居则在西城达子营。

对沈从文而言，这婚姻是极为圆满的。他得到的，

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沈从文自己很不会生活。还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应该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生活已经绰绰有余。但是每每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钱很快就花光了，而且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则天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得知此情，哭笑不得：这个“乡下人”，太不会照顾自己了，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于是便打消了继续念书的念头，和沈从文结婚了，从而好照顾他。

在事业上，张兆和之于沈从文也是一得力助手。就在沈从文结婚的那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担任了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一双翅膀。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沈从文凭着他一人之力，主持了《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然后寄到天津报社发排。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看稿、改稿，自然少不了张兆和。张兆和事实上文学水平也不错。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之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去了。”

对于自己的婚姻，沈从文十分满意。他在《水云》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因笔写成的文章，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

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而沈从文却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其生活和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他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的创作。在1931年至1933年间，他有20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此时，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也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世间》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时，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序言里，斯诺说：“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其中就包括沈从文那部风靡一

时的《边城》。

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沈从文在文坛地位的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

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这事实上是一贯的文学主张的体现。《大公报》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北平沈从文的寓所，经常聚集着一些文学青年，而沈从文因自己有初入道时的那种苦难历程，因此对于文学青年也是格外

关心。他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而这些来信勾起了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个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瑕疵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瑕疵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他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许多青年作者后来在回忆中都说：“……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对沈从文深为感激。

而对于那些在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常常慷慨解囊。他以自身的切身体验理解文学青年的艰苦，这种仁和慈爱是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思索所

酿造出来的。所以，生活其实是一本书，它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以爱与关怀去回报自己曾经得到过的爱与关怀。

三、构建人性的神庙

1934年1月，沈从文接到家里来信，说是母亲病重，看情形很难熬过今冬，母亲很想见他一面。于是，沈从文匆匆启程，旧历腊月19日黄昏，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故乡。

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觉得手足无措，一方面，他要陪伴已经病入膏肓的母亲走到生命的终点，另一方面，形势又不容他久留。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监视极为严密，而家乡许多人又都怀疑沈从文是“共产党人”，这是因为他同胡也频、丁玲的密切关系已经尽人皆知了。而在这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为严重的是，他弟弟(当时已是陈渠珍手下的团长)被陈渠珍疑心夺权，而沈从文恰又在此时回来，所以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于是，几天后，沈从文又匆匆离开了湘西。

然而，在来去家乡的这一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不禁引起了沈从文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思索。翻检起自己一路的记录，沈从文突然感到一阵阵的悲凉，一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感浸透了全身。

这全然不是自己想像和回忆中的湘西，回忆里的

湘西是经过自己情感蒸滤过的土地。十年来都市“文明”造成的精神重压，使原来的痛楚也带着一丝甜蜜，染上一种生机活泼的野趣。这次返乡，一入沅水，眼前的景象立即将自己从想象与回忆中拉回现实。

一方面，各种投机人物以不同方式寄生于黑暗腐败的社会躯体上，欺压百姓；另一方面，那些水手、普通百姓则为了生存而挣扎。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而那水手和妓女在艰难生活中奇特方式的爱，却又体现着神圣的人性。

“他刚走到他自己那只小船边，就快乐地唱起来了。忽然税关复查处比邻吊脚楼人家的窗口，露出一个年轻妇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锐声叫嚷起来：

‘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

年轻水手向吊脚楼一方把手挥动着。

‘唉，唉，我记得！……冷！你怎么的啊，快上床去！’他大约知道妇人起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

妇人似乎因为一番好意不能使水手领会，有点不

高兴的神气。

‘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砰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那时节眼睛一定红了。”

（《湘行散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这也就是人生。这些吊脚楼上的妓女，养身虽靠商人，恩情所结却在水手。他们只是“露水夫妻”，其生活方式同一般社会是那么疏远，但是眼泪和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情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而就在沈从文正陷于对人性的思索和人生命运的偶然与必然关系的思索的时候，又陷入于一场文坛的论争。这场论争同沈从文所主张的文学独立有关。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应该摆脱对于任何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对于文学本身都是有害的。他把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和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潭。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是沈从文

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当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真切感受为前提。

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应该具有独立性和永久性。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沈从文的这一理论，可谓精辟之极。而在30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里，他的这种文学观却遭到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

首先是沈从文的“京派”、“海派”之说，遭到“海派”文人的攻击。然后则是沈从文与鲁迅、茅盾之间的论争。尤其是后者，是30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之争。沈从文与鲁迅之争，起源于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针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的行为提出批评（当时国民党查禁的书籍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的攻击。而施蛰存则出于朋友的好心为沈从文辩护，其中一句话是这样的：“……

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施蛰存的辩词立即引发了鲁迅的批评，把沈从文归为“忠而获咎”者，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这其中，沈从文则可以说是被误会了。接着，沈从文又撰文对文坛上互相谩骂嘲讽的风气进行了批评，而这又引起了以“嘻笑怒骂皆文章”著称的鲁迅的批评。而事实上沈从文的这一观点虽有未加区分之嫌，但其心境实属对于文学前途的担忧。沈从文和鲁迅之间的分歧，明显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

沈从文与茅盾的争论则是关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差不多”现象。沈从文认为，当时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点差不多。而茅盾则认为文章应该有思想、有时代性。事实上两人的论争并不矛盾。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文学作品里面去体现思想性和时代性。沈从文的意思是作家应该有真思想，对人生应有深入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否则，就难免公式化倾向的出现。这场论争持续到1938年。

沈从文由于回乡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再加上他对

于文学独立性的主张，使他在从故乡返回北平的一段时间里，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在这些文章里，沈从文对环境保护性的描写、对人生命运的思索渗透着深刻的哲学意义。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小说《边城》。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情悲剧。老船夫的独生女儿，同一个清绿营屯防士兵“唱歌相熟”，肚子里有了孩却“结婚不成”，屯防士兵顾及军人名誉，首先服了毒，而老船夫女儿待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了，留下了那女儿——翠翠。翠翠慢慢长大了，老船夫心想，一定要把她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一定要翠翠喜欢，不至于让她再走她母亲的悲剧之路。而命运却不由人安排。顺顺家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翠翠却只喜欢老二傩送。更严重的是，一座新碾坊又加入了这场竞争——团总将它作女儿的陪嫁，正托人向顺顺放口风，要傩送作女婿，待顺顺家老大天保知道老二也爱翠翠时，同意傩送提出的公平解决办法：兄弟俩轮流对翠翠唱歌，谁唱动了翠翠的心，翠翠归谁。天保自知不敌傩送，遂赌气乘船下行，不料不小心被竹篙弹入激流淹死。顺顺家以为此事与老船夫有关，傩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不爽快，面子上对他冷淡了许多。傩送父子的冷淡，中寨人关于傩送决定要碾坊的谈话，翠翠外柔内刚的脾性，

当年女儿悲惨的死，全都综合在一起，“命运”仿佛给了老船夫当胸一拳，他终于无力再抵抗，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老二傩送因想到哥哥的死亡，又因翠翠误会而得不到她的理会，却又被逼着去接受那座碾坊，于是也赌气撑船下行。当翠翠终于把事情弄明白之后，便独自哭了一个晚上，然后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

作品里充满了沈从文关于人生的偶然与必然、理智与情感的思辩的痕迹。“十多年前，自己的生命处于沉睡状态，一任它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以自主，任何一种偶然的事变都会将自己带向不可知的方向。为摆脱人身的依附，求得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才走出湘西，进入都市。然而，这‘乡下人’的一点愿望，却不为人理解。当自己从深处思索这一生命独立的意义时，终不免与习惯相冲突。自己所属的民族命运，正与自己的相同。千百年来，为争得民族自主的权利，血染红了湘西的每一条官路和每一座碉堡。可是，即使甘愿成为附庸，却不免被视同‘化外’。‘偶然’协同‘必然’在兴风作浪，它不仅阻碍着人与人心的沟通，而且还隐蔽了事变的内在逻辑。‘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天命’思想障蔽了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耗损尽人们抵抗忧患的能力。”

在这部作品里，沈从文几乎融入了他全部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思辩。“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排泄和弥补。”

《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这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沈从文30年代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创作，展示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人生视野。他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握住人生的航线。

沈从文的小说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描写的是乡村世界这些作品有：《龙朱》、《月下小景》、《神巫之爱》、《阿黑小史》、《灯》、《会明》、《虎雏》、《萧萧》、《柏子》、《贵生》、《夫妇》、《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一个兵》、《边城》、《长河》等。在这些作品里，沈从文感叹着“乡下人”朴素的义利

观不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又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而忧虑。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解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时候，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入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沈从文小说的另一部分，则是描写都市人生的作品。包括：《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都市一妇人》、《泥涂》、《腐烂》等。这些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相对立的。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除了带有30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都市社会的黑暗，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

这种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的对立结构，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这是都市“现代文明”与原始民性的对立；是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这也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对立。这里的现实，是人性扭曲的都市人生图景与湘西乡村社会在时代巨压下的人性变异；这里的过去，是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

这里的未来，是人性向自然的复归。这种思辩的思想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沈从文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的复归。“五四”时期，当人们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的危机，不能不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成为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伟大旗手。然而，鲁迅很快感到了这种彻底决裂的困难和精神痛苦，又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积极部分的认同。沈从文的思辩恰恰表现为与鲁迅相反的程序。他的创作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强调了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伦理沦丧。但他同时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的封闭性、保守性不可分。在他对“乡下人”——一个原始民族弱点的反省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到一种新的竞争中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主义角度，还是从伦理主义角度感到的精神困扰，都是从不同侧面碰到的贯串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

第五章 风雨一扁舟

一、逃难——寂寞之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中日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而北平的知识分子，开始逃难了。这对于沈从文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时，长子龙朱不满三岁，二子虎雏出生仅仅两个月，这样，携家出走就困难重重了，因为这毕竟是逃难。张兆和觉得，与其一家人相互拖累陷入绝境，不如暂时分开。两人终于商定，沈从文先期离开北平，张兆和随后再带孩子南下，到上海聚会。于是，8月12日清晨，沈从文、杨振声、朱光潜等人开始坐火车去天津，本来打算从天津到南京后，再去上海。谁知刚到天津，就得知日军已于8月13日进攻上海，于是，他们不得不搭乘一艘去烟台的英国商船。船到烟台时，只见海上潜水艇浮出水面，炮口指向烟台市区。中日双方军队正在烟台对峙，战争一触即发。

沈从文等人只好赶上开往济南的最后一次火车。火车沿胶济线行驶，不时有日机从列车上空掠过。每当飞机出现时，列车便赶紧停下来，并立即发出警报，

车上男男女女便急慌慌跑下车去，在铁路两旁的田头地角隐蔽。望着敌机从头上掠过，远去，在云影间消失，又立即跑回。如此反复多次，车到济南时，已是半夜时分。在济南等了两天，沈从文一行又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过了两天，各大学来南京的教育界人士开会，并作出决定，转移湖南衡阳组办临时大学。同来的朋友劝沈从文一起同去武汉。

转眼又到了年底。这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的军队主力从南京退向武汉，战火正沿长江向上延烧，武汉的争夺战已成必然之势。沈从文又匆忙赶往长沙。在这里，沈从文见到了临时大学的一批熟人、朋友，他们正准备向西南转移。与大家一商量，沈从文作出了去昆明的决定。而后再返回武汉，对遗留工作略作交待处理后，沈从文等人再次来到长沙。在长沙，沈从文碰到了表哥黄玉书和弟弟沈岳荃。旋即，沈从文回到了故乡，作了短暂的停留。闻一多、萧乾、许维、浦江清、李宗侗等人也一同来到了沈从文家，听沈从文谈及湘西历史和眼前的人事变迁、边地的民俗风情。三天后，闻一多等人告辞，继续步行上昆明去了。

送别闻一多等人之后，伤愈出院的沈岳荃，也从长沙回到了沅陵家中。此时大哥沈岳霖也在家中。于是，兄弟三人多年来第一次取齐聚会，各人心里自然生出许多感慨。一时间，家事、国事、地方事全进入

兄弟三人谈话的范围。从哥哥与弟弟的谈话中，沈从文对近八年来湘西的社会变迁和目前情形有了明晰而透彻的了解。

沈从文这次返乡，与上一次返乡已经大不相同。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份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有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

这天，沈岳霖以沈从文的名义，将陈渠珍、龙云飞一批同乡文武大老，请到了沅陵家中，沈从文向他们介绍了北平、南京、武汉、长沙见到和听到的有关时局发展的消息，说明战火已沿长江向内地延烧，洞庭湖泽地带，必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战场。到那时，湘西将在后方战略物质供应和兵源补充方面，占据特别重要地位，这也为湘西人报效祖国，为民族尽力提供了一个最好机会。

沈从文这次回乡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

义男儿，被编为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取得了著名的“湘北大捷”。

沈从文逗留沅陵期间，沈岳荃已收到了长沙师部拍来的急电，限这位上校团长五天内率领在沅陵的两连伤愈士兵，向常德集中，并接收澧管区四营兵丁，作为本团补充，再开往南昌与日军作战。次日又来了第二次急电，将五日期限改为三天，算来明天就得出发。

第二天，兄弟挥泪而别。

此时，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身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台

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长河》按预定计划是要完成四卷的，但《长河》第一卷的出版过程，可谓历尽苦难，多次被删改，到头来弄得面目全非，且直到1948年才正式出版发行。又因种种历史原因，使沈从文终未能完成以下三卷，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在湘西短暂停留后，1938年三、四月间，沈从文搭乘汽车，前往昆明。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而此时，张兆和母子三人及九妹岳萌，途经香港、越南河内，此时也已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相互间说不尽的思念、担心、痛苦，至此方告结束。

不久，昆明就有日机空袭轰炸。九妹岳萌在一次轰炸起火时，忙着帮助别人救火抢东西，不料自己的全部值钱物品却被歹徒趁乱劫走。因受刺激太深，承受不住，神经有了毛病。不得已，由沈从文托人送往湘西沅陵，嫁给了乌宿地方一个乡下木匠。20年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缺粮断炊而饿死。

来到昆明后，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入北京大学(当时，西南联大所属各校上课不分开，编制分开)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在这时期，沈从文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

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学运动的论争。

1939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

1942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于寂寞在沉默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

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1940年—1942年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间，出现一个新的文艺派别——“战国策”派。他们以“历史形态学”为根据，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

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是“争于力”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而与“超人哲学”对立的“民治主义”，“就是提高群众的力量，压迫天才领导的行为”。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的“三道母题”：“恐怖”、“狂欢”、“虔恪”。“战国策”的理论主张恰好迎合了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沈从文立即写了《读英雄崇拜》对“战国策”的理论主张进行批判。《读英雄崇拜》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而有些人却以沈从文曾在“战国策派”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为由，指陈沈从文也是“战国策派”，沈从文也立即给予了回击。

二、烛照人生抽象之域

沈从文居住的村落，距云南著名的滇池只五里远近。由长住乡下与外部隔离所产生的孤寂，混和了一份现实引起的痛苦，沈从文常常在写作与家务劳动之余，独自来到村外的小山岗上，看滇池上空的云起云飞。

沈从文觉得自己被绿色所包围，所征服。绿色在流动，像一部伟大的乐章，在时间的交替中鸣奏。虽然眼前一切，因绿色分配比例的不同，产生着各种差异，它们却综合成一种比乐律更精微的境界。在这境界中，沈从文觉得没有了对生命的痛苦与愉悦，也消失了对人生的绝望与希望，人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谐和中还突出了一份自然的明悟，文字无法表现它，音乐也无能为力。

眼前的景象似乎正与人生契合，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因为生命绿色所占比例分量不同，人生被分割成各种不同等级的样式。——脱去自然与人生的具体形色，沈从文正步入一个抽象的人生之域。

人是特殊的动物，即眼前所谓生物的一种，也吸收阳光雨露，需要吃、喝与种族的繁殖延续，努力在各种环境中适应生存。这是人与其他生物所共有，人

终不能完全摆脱谋求“生活”的兽性。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说来，不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摆脱不了受自然的限制。因新陈代谢，只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得生存到阳光下。然而，人又终究不同于一般的动物，除了衣、食、住、行和生儿育女，即“生活”，人之为人，应当还有超越单纯“生活”的神性，一种属于人生高尚理想与情操的精神活动，这才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生命”。金钱对“生活”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

人不能没有“生活”，否则“生命”便无所附丽，然而，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人就与动物无区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

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就应当在生存的时候知所以生，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多数人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

“生活”与“生命”，是构成人生的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两个基本成份。人生若从深处看，一切冲突皆由“生活”与“生命”的矛盾而生。

想到这里，沈从文抬眼远望。只见远处，新收割不久的田地上，一些绿色点在白色残余禾株间勃起——庄稼收割后种下的蚕豆新芽，已普遍突破坚壳，解放了生命，已变成一片绿芜。近处，一些草木的银

白色茸毛种子，在微风中飞扬旅行，一些成熟的豆荚，发出爆裂时轻轻的声响。自然界生命的进化，正在长期的选择与试验中进行，象征着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他又开始陷入沉思。

支配人类命运的，是理性还是情感？是意志还是偶然？“生命”的发展，无从离开理性或意志，可是人生却充满了与之对立的“情感”与“偶然”。非理性的情感与非必然的偶然，是“生命”有计划按理性支配人生的巨大魔障。从消极的角度看，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人生中到处是偶然与情感设下的陷阱，稍一不慎，便不能自拔。而且，如果能依靠理性和意志改变命定，那么，又有什么可供我攀援？

一切奇迹都出于神，这由于我们过去的无知。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意志。

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屈原的愤世，庄周的玩世，现在是不成了。理性在活生生的人事中培养了两千年，应当有了些进步。

“意志”的培养从何着手：中华民族既然是个受文字拘束了的民族，进步的希望就依然还建立在文字上。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经典既然已全不适用，就应当重造经典。用新的抽象原则，重建民族的自尊心与自

信心。由于因缘时会，自己凑巧得到名为“作家”的职业。虽是“职业”，却无从依靠它“生活”。但它束缚住了自己的“生命”，将终其一生，无从改辙，自己不能休息，也无权休息，再过一会儿，就要重新回到“人间去，到都市或村落，钻入官吏颀颀而又贪得无厌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级倦于思索、怯于怀疑的灵魂里，年轻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样式，从中剪取可望重新生长的好种芽，即或它是有毒的，如果能加速旧有组织的糜烂，我也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

……

在这抽象的人生之域里，沈从文久久地徘徊、思索，而这思索最终又左右着他的行为。

三、飓风孤舟

战争终于结束了。8月15日，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热泪湿了沈从文的眼睛，心里反有了过去八年战争进行中少有的悲壮沉重。

今天是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事有凑巧，从报上载明的消息中，沈从文得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也将于今天在南京举行。几天前，沈从文已邀约了几个在昆明的朋友，来乡下相聚，一则酬答夫人十余年来操持家务的劳累，一则庆贺战争的胜利结束。昨天夜里，他写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9年前，在结婚三周年的时候，他也曾以同样方式，写过一篇同题小说，送给张兆和作纪念。当时张兆和看过文章后，与沈从文打趣说：“你画得很像，可是，你为了词藻美丽，恰恰把我的素朴忘了。”

1946年夏，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因张兆和准备回苏州住一段时间，沈从文送母子三人到苏州后，独自先期回到北平。

就在沈从文重返北平的同一个月，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国民党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集结50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800里战

线上，向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由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终于爆发。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全国内战的爆发，击碎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主建国的梦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因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困顿，改变着许多的人生态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对现实的绝望。

而沈从文则依然投入了他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工作。除了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外，沈从文还担任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于是，教学、写作、编辑文学副刊、指导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接待不断来访的客人，填满了沈从文的生活日程。

尽管如此，但沈从文不能不正视即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内战，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11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长文《从现实学习》，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

“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到那时，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

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

文章认为，这种“争夺”与20年前军阀政客间的“争夺”，既相异又相同。与当前相比，军阀间的混战已为陈迹，近于一种“离奇神话”，“30年来的现代政治，8年来的奴役统治”所培养的一切弱点“却又像终无从消失”。

沈从文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在思考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时，他曾说：“好斗与求生有密切的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结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可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

他希望人类最终能以“理性”战胜“愚蠢”，使自身摆脱“自相残杀”的战争阴影。

然而，在具象的层次上，沈从文又看到了依仗强力发动战争一方与不能不承担重负一方的是非区别。在国民党首先发动的这场内战中，他也看到了国民党依仗美国援助，使用美式装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真相。他在1946年8月写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就叙述过重返北平后在街头所见到的“另外一种事实——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但他终于无以摆脱战争可能毁灭民族生机这一可怕的前景带来的内心痛苦，不能不陷入无从解释的精神困扰。

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30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与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因此，有人称沈从文是“第四条道路”的鼓吹者。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国内战爆发后，萧

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份怀疑。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萧乾只好作罢，告辞而去。此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与矛盾，终于淡化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政治上不同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20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他的信念来自他特有的人生经验。

而沈从文对于内战所持的态度却给他带来了一场风暴。1948年，沈从文“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开始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这种批判逐渐从具体观点的驳正演绎成目的性的追究——沈从文的观点对外，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无法避免的没落命运”，于己，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冀望专利帝王的“特别垂青”。一幅幅沈从文的肖像

画被描摹出来了：《鸿鸾禧》里的穆季、介于二丑与小丑之间的“三丑”、“清客文丐”……

到后来，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被作了这样的描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

而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随着1949年2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和新政权的建立，沈从文越来越感到一种不平。他想起一年来见于报刊的对自己不断升级的批判。

“清客文丐！”

“地主阶级的弄臣！”

“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他无法接受这些判决。自己不是反动派，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似乎找不到支持这些判决的事实

根据。沈从文自信自己从来不曾与人民为敌。可是，自信无从代替人信。其时，一些与沈从文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人，正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而沈从文却被视为“反动派”，7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代表名单中，沈从文也榜上无名。

这似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现象。对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做出恰如其分的政治判断，需要多少精微细致的研究分析，然而，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国事千头万绪，多少重大的问题亟待处理，个人的生命哀乐与之相比，自然算不得什么。而且，社会的除旧布新，常常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一些具体问题的精辨细查，只能留待大局已成定势之后。历史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实施它的“四舍五入”法，一些历史的误解也就常常因此发生。

沈从文却解不开这个结，他也缺少解结的必要前提。他并不在意个人的名利得失，但他从中感到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追究这是为什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他的大脑：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和人事处理，是不是出于上面的示意？是不是即将对自己做出极端政治处理的信号？一念及此，沈从文内心里生长起恐怖的阴影，而且无从驱散了。这也难怪，出于对这个新政权早已在另一片土地上铸形的政治管理形态的隔

膜，沈从文自然无法理解舆论的批判与实际政治处理之间，既相联又相区别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他忧心忡忡，神色不宁。而他的这种情态使他在亲友间也陷于孤立。

在这种内外交攻之中，沈从文完全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他在一种悬想的情景中起着大恐怖。——20多年来，自己在旁人不易想象的情形中，追究‘文学运动’的意义，学习运用手中一支笔，实证生命的价值，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也即将失去意义。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沈从文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软弱。

“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理想与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

几年前留在纸上的这些墨迹，此时已变成一种谶语，一个正逼近沈从文眼前的命运的预言。

他开始足不出户，整天关在房屋里胡思乱想。生命内部起了强猛的旋风，来自生命深处的忧患与恐惧正在加重。灵魂陷入茫茫迷雾之中，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紧张与自恐自吓下，承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强大张力，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

痛苦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他游目四瞩，急欲

找到一种解脱痛苦的办法。突然，他看见了放在书桌上的一把小刀，那薄薄的锋刃正起着一种诱惑，沈从文对它有了一种亲近感，起了一种需要。

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那把小刀……

这时，在沈家作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一个堂弟，正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传出一阵轻微呻吟的声音，心里起了疑问，感到有些紧张，赶紧上前推门。门纹丝不动。张中和急了，返身用力将窗玻璃砸碎，随后从窗口跳入房内。眼前的情景使张中和吃了一惊，沈从文已用小刀将血管划破，头上一片鲜血模糊，正处于半昏迷状态。

张中和失声叫了起来。

沈从文被迅速送进了医院……

从昏迷中醒来，沈从文以为自己置身于牢房，一见张兆和到来，便急忙说：

“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

见此情景，一缕莫可言喻的悲哀涌上张兆和心头。她黯然神伤，眼泪禁不住滚落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悬想中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在事实上并没有发生。随着神经正常功能的恢复，各种恐怖的阴影和幻象逐渐消失，生命渐渐复归稳定。

沈从文病愈出院后，他的工作编制仍留在北京大

学，但人已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

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

这期间，沈从文曾经拿起笔来，想写一写身边的人和事。可是，写着写着，耳边却响起了一个严肃的声音：你这个不安分的乡下人，你可知道，你手中一支笔已经过时了，你所欲写的，对目前这个国家、社会，难道不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你为何只醉心于与这个伟大时代不相称的人生琐屑？

沈从文感到一种惶惑。思前想后的结果，他将写成的文章揉成一团，丢进了纸篓。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为此感到委屈。他明白，一个民族、国家的翻身重建事大，个人能不能写小说事小。眼下，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大西南和西藏进军。国土的统一已成定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因军阀割据形成的分裂混乱已告结束，历史迎来了中华民族重

建国家的契机。从现在开始，将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开拓。而这，恰恰是他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

经过在“革大”的学习，沈从文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951年写的《我的学习》中，这样写道：

“经过学习，就业已认识到，自己过去习作中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解放前夕以抽象观念拼合来说明战争——虽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实为知识分子 徨无主的心理反应。”

“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已腐烂不堪。我20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对一切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又以为文学与文化，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

“……因此虽活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中，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19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略略知道沈从文某些思想的由来及他学习后的体会。

后来，沈从文的工作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此前，

在革命大学期间，他曾找到负责他们班生活管理的解放军班长，想找点事做一做，而班长请示回来对他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

沈从文陷入了沉思。

第六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

一、在退避中进取

当革命大学的那位解放军班长请示回来，答复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的时候，沈从文无言以对。这答复刺中了沈从文的痛处。他想写些东西，却写不下去，但如果放弃写作，似乎是异常艰难的。

沈从文再次面临了人生的抉择。

他不忍心放下已操持了20多年的文学创作，因为那是自己注入全部生命的事业，早已下定决心“终其一生，无从更改”的。他知道，时代已经不同了，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社会“政治高于一切”、“文学要从属于政治”的要求之间显然存在很大的冲突，他的思想方式同政治要求之间距离太远，是无法融合的。虽然他在自己的检查里说要跟上形势，并在创作中实际体现，但这却并非易事。长期积习形成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更改掉的。他觉得“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

可是，如果改行的话，他又能干些什么呢？都5

0岁的人了，改行的话便意味着半生经营的事业基础全部报废，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要再想做出太大的成绩似乎是很难的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虽然他不想死，还想为国家多做点事。

沈从文陷入了艰难的选择之中。好在这期间他离开革命大学随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不需要当即作出最终的决断，他还有时间慢慢思考。

这期间有一件事对于他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委托沈从文为博物馆买文物。有了这次经验，他在土改工作完成回京后便被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随军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出入。当时北京的120个古董店中，沈从文亲自参与检查的就有89个。成百万的古代文化珍品从他手中经过，不由地又勾起了沈从文对文物古董的眷恋，他明白，他这后半生恐怕注定要与文物打交道了。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是很早就有了的，可以从1921年至1922年沈从文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时算起。刚到北京时，琉璃厂、天桥、廊房头，跑到各处去欣赏古董店和地摊出卖的文物，几乎成了他每日必修的功课。到30年代，当他的生活从贫困中解脱后，他便开始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沈从文收买文物

其意本非是想收藏。买来以后，常常是看了几天便送人，然后再买，再送。就这样，一批又一批文物从他手中传递，而这些文物所涉及的广泛的知识，一种真正的财富，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沈从文对文物似乎是天生的有缘，在正式以研究文物为业之前所做的一些搜集工作即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在北京时他专收瓷器，还在外国人之前，他便注意到了青花瓷器的价值；在云南期间，他专收耿马漆盒；后来又转向绵缎丝绸，而这些与他后来的一些专著都有相当的姻缘。便是在当时，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面便已表现出相当的独到之处，早在40年代，他就写过《读展子虔的游春图》一文，比证相传为隋代画家展子虔所作《游春图》真伪，洋洋数万言，叙隋唐以来中国画史，如数家珍，并对隋唐以下服饰、装裱、绢素及人物起居方式各代特征多有涉及。其见解在30年后方为不断出土的众多文物提供的资料和后来的研究所证实。他还发表过《收拾残破》等论文；就抗战胜利后如何保护文物大声疾呼。当然，这一切在当时对于沈从文来说只不过是一时之兴而已。

清查北京古董铺的工作结束以后，沈从文就不得不回答工作去向的问题了。博物馆提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供他选择，沈从文却选择了留在博物馆，他对博物馆领导说：

“工资不要超过馆长，能给我的工作提供方便就行了。”

这一决定终于导致了沈从文与文学创作的最终告别，虽然他在后来也曾萌发过写点文章的念头，却俱因没有时机或舍不得放下文物研究而放弃了。

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见到沈从文时对他讲：

“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

沈从文的心动了一动。而上海开明书店来信说他的作品业已过时，他在开明书店的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沈从文的心便又冷了下去。

1957年2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台，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出版界也出现了重新出版“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热潮，就在这期间，《沈从文小说选集》得以付梓，这是解放后直到70年代末他所出版的唯一一本选集，如果再迟一两个月的话，便不能出版了。而此时沈从文正忙于自己的文物研究，根本没有动笔的念头。

到1961年“双百”方针重提的时候，沈从文和其他一些人在王震的安排下去江西井冈山山区参观访问，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写作。此次沈从文的创作热情重新燃起，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最终却放弃了。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无法搁下那一个个正在

进行的文物研究专题。

当沈从文紧紧拥抱着文物研究工作不放时，他无法割断与文学创作的一缕情丝；而当真要从文物研究中脱出身去时，他便强烈地感到了文物研究对他所具有的独占力量。

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上倾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每天他都提前赶到博物馆门口，等候开门上班；中午他从不回家，经常拿一方手绢包两个烧饼，就在馆里填饱肚子。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供浪费了，在他感觉里，时间就是生命。不止一次，中午下班铃响了，他仍聚精会神地记录材料，结果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里。

沈从文的工作是给文物分类写标签，在常人这是一件机械的工作，而对沈从文却是个极好的机会，因为这样可以接触各种的文物。沈从文在抄写的同时，仔细观察分析每一件文物。他且看且写日记，人转手转脑也转。在分析、思考的同时，他也博闻强记，对形象的感受力极敏锐细腻，又擅长系列化排比，加上那份乐此不疲的心性，他正向文物研究的高峰攀登。

日月升降，寒暑交错。几年过去了，沈从文以他默默无闻的勤恳耕耘，成为文物史方面几乎“富甲天下”的专家。在他的大脑里，储藏着无数的文物和与它们有关的材料，他简直自己便是一个博物馆。辛勤

的劳动培育出了累累的硕果，一篇篇文物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了，一部部专著相继出版了：《唐宋铜镜》、《我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他的生命之火再次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沈从文在自己刻苦钻研的同时，还时时关心当时国家的整个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情况。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以后，他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中华民族的先民创造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今天的人民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却落后于外人，这不能不使沈从文感到无比心焦。如大同云岗石窟，40年代日本人水野清一就写出了30多本一套大部头的研究报告，而中国本土连一套像样的介绍图书都找不到。敦煌在中国西北，而“敦煌学”又是日本人居领先地位……每思及此，沈从文总有芒刺在背之感。

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间实在有限，应做之事太多，而能做之事却又太少，面对自己归纳排比出来的一大堆研究专题，沈从文感到无比焦急，他一个人是永远无法做完这些的。他说：“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怕来不及。我愿意把一些专题分给年轻人，把我积累的资料交给他们，完稿以后以他们的名义发表。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

面对当时文物考古领域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

之间相互保密、封锁的严酷现实，沈从文无力干涉，但他却尽自己的所能为国内各单位与个人的研究提供帮助。他家常有人上门求教，他也把自己的专长“送货上门”，或者接受外单位的“加工订货”——替人修改稿件，甚至应承“代购”、“配货”的业务。青年高华写信去请教，并把论文的初稿也一并寄去，沈从文对他的问题给了许多明确的答复，回了一封四倍于来信的长信。一罗姓教师编写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沈从文几乎逐字逐句提意见，修改，反复四遍，竟使原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增加到20余万言。

沈从文在博物馆里有时还作讲解员。有一次他接待了一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从此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沈从文的讲解引起了王序对古代文物的强烈兴趣，同时也为他铺就了后来的人生之路。1958年王序复员回国后，选择了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并在后来担任了沈从文的助手。

中国的文物研究落后，不能与其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相称，是不言而喻的。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提出要组织人力编一部中国自己的服装史，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立即推荐了沈从文，周总理也当即同意了。沈从文接到委托后，欣然允诺。他钦佩周总理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的信任，更愿意做这种开拓式

的“打前站”、“为后来者开路”的工作。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研究之路。

二、笑面狂飙

沈从文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便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那个荒唐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毫无道理的无赖，时时掣肘着他的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使用的方便，他常将图书图片资料四处放着，凌乱却自有逻辑。偏偏有人却要把他的书收齐放在书架上，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全国博物馆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极珍贵却又极便宜的文物却被当作浪费的典型例证拿去陈列，还要他去参观，接受教育。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日本一些中国文物研究专家组团赶来祝贺，沈从文找了些他们很少知道的文物给他们观看，日本人深感惊讶。可座谈时却没有沈从文的份，派了个作行政领导的“门外汉”去，令日本友人莫名其妙。1961年的时候沈从文和另外3人合作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图谱》，就在将要付印时，中国科学院方面却以书稿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要求另组班子，重新修订。他后来才想到这样做的原因：有人想争夺成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写作的初期还是相当顺

利的。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社负责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人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第二年春，一部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中途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1964年冬付印，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可是，1964年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却导致了这本书的天折。

国内经济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阶级斗争又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正制造着中国的“劫数”。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8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确规定这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

沈从文很“幸运”，在运动一开始便被“揪”了

出来。罪状是极容易组织的,而且还是“五毒俱全”,可是现在想来却又是何等的荒谬。

沈从文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被作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遇到批判。沈从文被批斗,好在没有被拳打脚踢,只是受到一些不太大的折磨。

在狂飙飓风面前,沈从文镇定自若。任那些“革命人士”毁掉他的资料和成果,他却将这些有用的东西全数纳入了大脑。一天,军管会的一位军代表将他叫去,当着他的面将他放在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末了,那位军代表将一部分认为没问题的图书资料还给沈从文,加上一句:“你不要看不起我,以为我没文化!”沈从文默默无言,将剩下的图书资料抱回了家。

因为沈从文不是“当权派”,所以在第一道冲击波过后,便不再被“重视”,他被勒令去拔草和打扫女厕所。这种日子没有太长,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1969年的12月底,沈从文被连哄带骗地送到湖北咸宁,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和他一起去的,只有博物馆的另外两位年老的高级工匠。

由于不再作回京的打算,沈从文把一些必需的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都带了下去。他先在咸宁住了半个

月，然后又搬到双溪去，在一个被称作“七五二高地”的地方看守菜园。沈从文的生活极其糟糕：住处极差，房屋苦漏，而且地方偏僻，几乎与世隔绝，再加上无书可读，沈从文不免感到孤独寂寞。

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沈从文仍念念不忘那本服饰研究。虽然有关的资料 and 工具书早已散失，然而10余年沉默努力的结果，却将经手过眼的以万千计的文物，深深地藏在了沈从文的大脑深处。于是，他根据记忆，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应当增补的图案一一写出，又就国内文物研究始终近于空白的20多个专题，分门别类，将有关材料排队。有关材料的来源、性质、发展中的情形，不同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制约、促进的原因，凡是在脑海中出现的，均一一写出草目，先搭出架子，再随想随补。时日稍长，身边竟积累了一大堆卡片。寂寞之中思前想后，沈从文不由地又产生了动笔的欲望，他为侄儿黄永玉的家世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楔子”……

1970年夏秋之交，沈从文病倒了。精神的孤寂和环境的恶劣，诱发了他原来就有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其时，他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他病得很重，血压高得惊人，被送进了咸宁医院。依靠药物治疗，再加上坚韧的意志，沈从文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想起不久前去世的大哥沈岳霖和姐夫田真一半个世纪中

对自己的支持与鼓励，他写下了“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的愿望和“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的决心。他希望国家终有一天能够清醒，发奋图强，他也不愿自己过早死去，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不单是为自己，更是为国家。

1971年冬，沈从文返回了北京。这次回京是因为他病情加重，身体逐渐浮肿，连日常行动都成问题，经特许后才得以实现的。在这段时间中，从北京到咸宁、双溪，再转丹江，到重返北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沈从文先后六次搬家，大病三场，共辗转数千里，经历了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

这样来回折腾，使沈从文心里产生了怀疑：让全国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得力可靠干部，放下手中工作到农村接受教育，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想起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感到非常不安。其时由林彪事件引发的“批林整风”，逐渐演变成“批林批孔”——“四人帮”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其中包藏的用心，已为沈从文觉察。

沈从文极其正直，绝不向邪恶屈膝。在受苦的日子里，从不迎合权要以求自保。在他看来这样做，从小处说，会招致意外灾星；从大处说，只会丧失自己的人格，颠倒做人起码的义利取舍。

回到北京以后，沈从文立即投入了《中国古代服

饰研究》的编写修改中去。

他要回了离开北京时剩下的一间房子作为工作室，张兆和又在小羊宜宾胡同弄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于是沈从文的工作室便成了“飞地”，沈从文每天得来来回回跑。

先是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他先前编的那本专著已重新看过，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对。于是，沈从文将已被闲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重校，一个月后便交了稿。没想到这一去还是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立即跑去看他。看到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执著，王序主动跑来帮他。另一位在“文革”前相识的女青年王亚蓉也一块来了，她答应为沈从文描摹文物图像。

共同的志向将两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全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尚处于全面停顿的情况下，他们三人组成的文物研究小组却已经开始了飞快的运转。

为了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更趋完善，沈从文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以前搜集的资料早已荡然无存，一切都需从头做起。小组的研究工作艰难而又顽强地进行着。不多久，整

个房间便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墙壁上、窗棂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是。还有写满了各种说明文字的大大小小的字条。床上有大半地方堆着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里，人便躺在书上。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混乱不堪，但在沈从文，确是极和谐的音乐。

登门造访的一些亲戚、朋友感到不解，劝他不要傻干：

“你作出这些来有什么用？国家给了你什么？”

沈从文却只是微笑。他知道，他已经73岁高龄了。精力已大不如以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垮掉。他不愿将自己脑袋里的东西带进坟墓，只要头脑还能用，他就要抢时间把20年来他所学的分门别类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哪怕只是一部分，至少也可给后人一点帮助。

不知节制的连续工作，使沈从文再次病倒了。血压升高，眼睛也看不清字迹了。一份“老之将至”的感觉涌上心头。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沈从文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总理的遗容，沈从文陡然感觉身体里少了点什么，一阵从未有过的灰心掠上他的心头。随即他便振作了精神，他决心将工作加速完成，以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

同年十月，“四人帮”垮台，然而一场浩劫后遗留的种种问题却需费时解决。在此后的三四年间，虽然国家有关领导人多次问及沈从文及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情况，沈从文的生活工作条件却无大变。

三、夕阳无限好

1978年，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了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

10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校正增补工作开始，1979年1月，修订增补工作完成。为纪念周恩来生前对这本书的关怀，全书保留了原来的编排体例，并把原先拟定的200幅图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资料一律作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1981年，该书问世。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包括数百幅实物图像，近20余万说明文字，虽然实际编写只用了一年时间，但却先后增补修订数次，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

“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各国纷纷派人接洽，或愿购版权，或欲翻译，凡此种种，均使本国学术界一睹而后快。

这部著作对自殷商到清朝近三千年的中国各朝代

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索，掀开了中华民族古代灿烂文化的一角，从服饰这个侧面展现出人类生命创造的种种奇迹。它同解放后沈从文的其他研究成果一道构成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但这首歌却比其他的要响亮得多，动人得多。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中国灿烂文化的一部分，还能并且应该能参悟出沈从文融合于其中的生命部分。

这是一部阐释，比证中国历代服饰形成演变的著作，然而其中隐伏的生命——文化意识，却特别引人注目。这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其所描绘的生动人生表象中，积淀着沈从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学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应是沈从文观察现实与历史现象的生命哲学基础。

在沈从文看来，生命的形式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现为某些僵死的理论教条，而是通过实际人生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存在。在现实社会中，它由社会的人事写成，而在历史人生中，它则通过物质文化的实际创造显示。因此，在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同各种阐释人生的书相比，沈从文将自然和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书；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种史籍记载相比，他又将成百万计的各色文物看成另一本活的大书。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

经济形式、阶级分化、生活习俗、宗教、文学、绘画以及工艺美术等等，又是彼此制约，相互促进的——这便是沈从文的文化观：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相互联系形成有机整体。文化各部门的相互制约与联系规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的演变又导致生命形式的变化与转移。

从这种生命——文化既有机统一，又发展变化的观念出发，沈从文开创了一条独特的文物研究路子：这就是以实物为主，“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这比文物研究中历来承袭的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方法有极大的优越性。例如他在谈及《方言》中所说“绕衿谓之裙”的含义时说：

历来从文学角度出发，对于“衿”字解释为“衣衿”固然不确，即解释为“衣襟”，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亦始终难得其解。因为这种衣物，原来从大襟至胁间即向后旋绕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另一式则仍回绕向前，和古称“衣作绣，锦为缘”有密切联系。

这一见解，就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所可及。

这种方法也被用于书画鉴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提及了一系列与服饰问题有关的传世名画的真伪，对一些已成定论的作者和创作时代，提出了质疑和自

己的新看法。这种综合鉴定的方法，沈从文早在1947年就已经提出并实际运用了。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他就指出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式初唐体制。淡红衫子薄罗裳乃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沈从文的研究，动摇了书画鉴定中传统的“帝王收藏，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原则。

这种文献、诗文与实物互证的论述方法，文学的描绘形容增加了服饰的色彩和生命。反过来，实物的具象性，又弥补了文字艺术的模糊造成的缺陷，是足以破千古之惑的。

这一研究方法在实际掌握与运用时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研究者必须具有极为宽泛广博的知识基础，以及这诸多不同门类的知识融会贯通所培养的文化通感和悟性。历史似乎有意造就沈从文，他前半生做为文学家的经历和修养，他自青年时代积累的书法、美术和文物知识，还有他独到的鉴赏能力，他的“读书多而杂”——各种野史、杂说笔记、工艺百家之言的广泛涉猎，以及解放后20多年间经手百万计文物所得的实感经验，为沈从文开创新的文物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常人却是没有机会可以造就的。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沈从文先前的积累

都是些铁矿石的话，那么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就像是冶铁，提炼人生中的精华部分变成文学，以飨读者。而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则似在原先冶铁的基础上炼钢。将那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组成一块极有价值的钢，不只具有很广的用途，而且极显那工匠的功底和高超技艺。

就在中国学术界殷切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同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成就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国内也出现了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呼声。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不断有人去湘西访问，了解那曾养育了沈从文的神秘土地，寻觅沈从文的人生足迹。有关沈从文的传记、评传和研究专著相继出版。西方文学界还有人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天道酬勤。沈从文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的一生充满了机遇与转折，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沈从文说：

“我没有天才，就是两个字：‘耐烦’。”

凭着锲而不舍的惊人毅力，这个高小毕业的“乡下人”，先后在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两个领域获得巨大成功。这，也许是一种奇迹，也许……